

360.75
352

T26
21

一十之叢文亡救

抗戰與國防經濟建設



活生

四分五
書

一十之叢文亡救
設建濟經防國戰與抗

著等民哲馬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六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2359—

一十之叢文亡救 設建濟經防國與戰抗

每冊實價貳角五分

著者 馬哲民等

印翻准不。有所權呀

(漢)版初月六年七廿國民華中

近

代

經

濟

學

說

史

現代新興的政治經濟學說，是跟一切非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鬥爭過程中生長和強固起來的。所以要更正確更澈底地了解新興的政治經濟學說，就必須了解過去的政治經濟學說。本書就是根據「動的邏輯」的觀點，來把各歷史階段各學派的經濟學說，加以論述，並尋求出牠們的發展法則，指明牠們的時代背景，正確地估計牠們在歷史上的意義和作用。

沈志遠著
一元二角

政治經濟學講話（增訂四版）
新經濟學大綱（增訂三版）

張仲實譯
沈志遠著

一元四角
二元

中國金融貨幣問題
中國財政之病態及其批判

章乃器著
孫懷仁著

八角
一角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再版）

青年自
學叢書

柳湜著
五角

社會經濟形態（百科小譯叢書）

沈志遠譯

中印刷

各地書店發售

總店 漢口 交通路

怎樣研究中國經濟

青年自學叢書
(版) 實價三角
錢俊瑞著

中國經濟論文集(已出三集)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第一集六角半
第二集六角

中國經濟年報(再版)

中國國防經濟建設(再版)

黑白叢書 錢俊瑞著 每冊二角

中日經濟提攜(再版)

黑白叢書 駱耕漠著 一角五分

戰時的財政問題(再版)

黑白特刊 駱耕漠著 四 分

戰時的金融問題(再版)

黑白特刊 駱耕漠著 四 分

中國經濟讀本

戰時社會
科學叢書

石西民著 印刷中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二章是敘述目前中國一般經濟狀況並批判一些歪曲的觀點；第三章是闡述研究中國經濟的方法論；第四章是說明研究和調查農村經濟的方法；第五章是講搜集和處理材料的方法；第六章是分析中國經濟的性質；最後是闡述目前研究國防經濟之必要。全書用故事體裁寫成，文筆生動有趣，實是年來以輕鬆筆調寫嚴肅問題的最成功的一本作品。

各地書店發售

A3060

目 次

一 經濟政策

一、抗戰中的經濟政策.....馬哲民(一)

二、戰時財政經濟問題.....黎百強(十二)

三、抗戰過程中的經濟危機與解救.....陳長蘅(二十四)

二 經濟建設

四、最後國防經濟的建設.....羅敦偉(三七)

五、速建設西南.....董時進(四四)

三 工業問題

六、戰時工業問題.....

孫懷仁(四九)

七、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

新華日報(五六)

八、後方工業應籌設研究所議.....

吳世昌(六一)

四 財政問題

九、戰時金融政策之缺陷及補救方法.....

衛挺生(六七)

十、戰時財政與『合理負擔』.....

千家駒(七五)

十一、論戰時通貨膨脹.....

伍啓元(八一)

五 農業生產

十二、抗戰期中農業生產之建議.....

汪呈因(八九)

十三、徵抽壯丁和生產問題.....

漢夫(九八)

抗戰中的經濟政策

馬哲民

一

現代戰爭之與經濟的關係，是密切不可分離的；差不多現代國家的戰鬥力，完全由其經濟力來決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例如，不僅軍事工業之發展，係與一般的工業之發展，互相關聯，並且一切軍需給養的供給，和社會秩序之安定，亦無不依賴於其國民經濟的充實。誰也知道，歐戰時德之失敗，即在於遭受協約國的封鎖，致使其國民經濟，陷於枯竭，無法支持。因此，現代國家之於戰爭，莫不於其國民經濟，有相當的籌措和準備！

何況現代國家之軍事動員，同時即是其一切力量的動員。譬如說爲增加兵員，則不得不動員一切人力；爲增加軍需，則不得不動員一切生產，爲增加戰鬥意識，及提高軍事技術，則不得不動員一切文化與教育等等；可見每個軍事的動員，即是全社會

的動員，亦即是國民總動員。在這種包括全社會的動員之中，須有相適應的政治機構，與相適應的文化或教育制度，固不待言；但尤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相適應的經濟政策。何則？因戰時的經濟政策，不僅可以增加戰時的生產，以提高戰鬥力，並且可以由其經濟政策之命運，決定戰爭的意義和前途。例如歐戰時帝國主義列強，與蘇聯的戰時經濟政策，雖同具有發揮戰鬥力的作用，而其意義及前途，却一在保護有產者的利益，以發展資本主義，一在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以發展社會主義。

因此我們雖不能說離開政權的性質，政治機構，乃至國民經濟的基礎，可以憑空的產生戰時經濟政策；但現代戰爭之與經濟政策的關係，却異常明顯，不容忽視！

二

我們的抗戰，乃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反日本帝國主義之征服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個戰爭，既不同於國內戰爭，亦不是爲實行侵略的帝國主義戰爭；而是我全民族、全民

衆，爲求國家民族之獨立平等，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之野蠻的侵略，以不至淪爲亡國奴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中國的各階層，雖在利害上並不完全一致，然而對於民族之解放，使大家不做亡國奴的要求，却是相同的！因此，我們的抗戰，乃是全民族的、或全民衆的對外戰爭，絕不是一個階級，或一部份人的戰爭；惟其如此，我們抗戰，乃能有動員我民族全體，以赴戰爭的可能；同時，亦只有動員我民族全體，以赴戰爭，才可以獲取抗戰之最後的勝利。

自然，爲要達到動員我民族全體，以赴戰爭，政治上的動員，乃至文化上的動員，都是必需的條件，而經濟上的動員，於抗戰中之軍事給養的供給，及國民經濟之安定與發展，都直接或間接的關聯着，尤屬必要之圖！因此，在抗戰中之經濟的動員，已不是是否應該的問題，而是應該如何的問題。如何動員我們的經濟力以赴戰爭？這便是我們在這裏應該討論的中心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一則因其內容，本來就很複雜，不容易片言而盡；再則因經濟的動員，與政治的動員，及文化的動員，都有關係

，無法由其孤立表現。所以在這個有限的篇幅中，我們只能談其大概，揭其原則，絕不能應有盡有的說個罄盡！

三

(一)抗戰中之經濟政策，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我們不僅要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及智力，以供給抗戰的需要，並且要培養一切人力、物力、及智力，維持長期的抗戰。因為有許多人，對於戰爭的觀念，總覺得是百分之百的消耗或破壞，沒有一分建設，所以他們只知道要人出錢出力，而不知道培養民衆之出錢出力的能力。如果照這種辦法幹下去，不僅以我們落伍的經濟，不堪一再犧牲；並且是將我們求民族生存的抗戰，變成斷送民族的生機，其危險誠莫大焉。

(二)抗戰中之經濟政策，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必須了解對抗戰供給人力和物力的，到底是些什麼人？或什麼地方？因為有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認清楚我們抗戰的經濟基礎，和抗戰之人的要素；所以他們總是持着中國是都市支配鄉村的謬調，以為抗

戰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智力，都只有靠都市的經濟力來解決，如果都市失守，便沒有抗戰的前途！老實說，這種漢奸失敗主義的理論，完全不理解中國的都市只是買辦、商人、金融財閥、乃至官僚集合的場所，只是靠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吸收原料和銷售商品的商業關係來維持，並不能即作為抗戰的根據地；同時，他們抹煞了抗戰之物力和人力的供給，主要乃在農村的事實；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農村經濟，乃是中國國民經濟主要部門，中國農村人口，佔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三)抗戰中之經濟政策，第三個要注意的，就是我們對於抗戰之軍事力量的充實，絕不能單純根據營利主義的要求，必須依照全民抗戰的原則，平衡出錢出力的負擔。因為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以其政治機構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且其戰爭的意義，亦在於資本家的利益；所以其經濟政策，亦多以資本家的利益為本位，根據營利主義，來發揮其軍事力量，往往是一般的人，都為戰爭犧牲了，資本家却反獲取了戰時利潤。我們中國，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並非有一個完全的商品經濟

及其平均利潤的法則，我們的抗戰，既是全民族的或全民衆的，我們對於戰爭的權利和義務，當然是相互平等，不能分別孰輕孰重。

(四)抗戰中之經濟政策，第四個要注意的，就是一般的戰時經濟，大都以統制經濟爲基礎；因若不對國民經濟具備着統制的力量，則所謂戰時經濟，幾無從運用；但是，我們的國民經濟，還是以小生產，甚至農業佔優勢，經濟組織，非常散漫，生產和消費，都不集中，則不能實行嚴密的統制經濟，自不待言！所以有些人便以爲我們除了金融和交通等，可以由政府來統制，實施戰時的經濟政策外，其他一般的國民經濟，仍應取放任主義。這種理論，初看起來，彷彿很對；然若仔細考察，却沒有什麼根據。因經濟政策，固須以統制經濟爲工具；但亦不是說，除了統制經濟外，便不能運用經濟政策。因爲一則運用統制經濟方法，本來很多，不必限於直接統制，再則對於小生產之統制除了於金融及交通方面外，還可以運用合作社一類的東西，加以調節或控制。所以我們應該了解，在工商業發達的國家之於戰爭，固應實行戰時經濟，即

在工商業不很發達的國家之於戰爭，尤應實行戰時經濟——否則根據其零落的國民經濟，固不足以有雄厚的戰鬥力，且以受不住戰爭的犧牲和破壞，易於破產。何況我們的抗戰，本是一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如不將全民族之物力和人力，集中統一起來，即不足獲取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於抗戰中之經濟政策的實施，成了一個最切要的問題！

四

依照上述原則，我們可以知道，在抗戰中的經濟政策之實施方法，大約如左：

(一) 應將都市——特別是沿海各都市的工業及資金，移至內地，集中發展軍需及日常用品的生產；乃至改良農業生產；

(二) 應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村的自給力，平衡農村之出錢出力的負擔，減輕租稅，並動員農村的婦女，從事勞動，以補助因壯丁抽調所發生之勞力的不足；

(三)應按照都市及農村的各職業分別組織成立省市縣等經濟委員會，而以政府爲監督或執行機關，以建議及實施各種戰時經濟；

(四)應推廣農村合作社事業，成立農村的合作社網，俾以羣策羣力，調節農村金融，健全農工產品之運銷機構，而救濟小農經濟的貧乏，和小手工業的凋落，增進農村生產；

(五)糧食之存貯，應於靜的方面和動的方面，同時並進，蓋如只有靜的積蓄，過於妨害農產物之流通，不若在動的方面，只於糧食出口之處，加以限制，而任內地的糧食，自由行銷，則不僅糧食之需給，可以平衡，而農村經濟，亦可以流暢；

(六)金融之統制，於實行法幣政策後，已大半成功，但對外匯兌之管理，既須切實執行，以免因購入軍火之大量出超，危及金融，且對於以戰爭而使財政支出過多而自然發生的貨幣膨脹，亦須加以相當限制，免致物價飛漲，影響一般平民的生活；

(七)抗戰中之財政政策，有些人主張膨脹貨幣，因為這是最早省事，而且自行法幣

政策以後，對外匯兌，可以控制，不至因膨脹貨幣，引起外匯之過度的跌落。但是在長期抗戰中，以調達軍費之不易，膨脹貨幣，固為終所不免之事實；然而一則因膨脹貨幣，足以使物價飛漲，影響平民的生活，減少對外輸出，已非有利；再則此種辦法，主要的只在於調達軍費，並未注意及於財政政策之運用；換言之，即戰時的財政政策，一方面固要調達軍費，而另一方面又要執行平衡負擔，及培養物力與人力的任務。所以抗戰中之財政，除提倡救國公債，救國獻金，以外國之財產，發行公債，挪用國人在國內外銀行之存款，撙節不必要的用途，提倡節約，舉借外債等外，於戰時利得稅及累進所得稅之徵收，漢奸及敵人的財產的沒收等等，亦可行之。

(八)抗戰中對於大眾生活之改善，亦應為經濟政策中之主要工作。有許多人以為戰爭只是一個單純的破壞，而且大家應該拚着犧牲，何以獨主張改善大眾的生活。他們不知道所謂大眾——農民、工人、手工業者，是國民中的最大多數，他們的勞動，是國民經濟之生產的主力，是國民經濟之消費的最多數人口，是構成戰鬥員之主要的

成員，是供給軍需，辦理運輸，建築軍事工程等等不可缺的要素。由此可見，他們的地位之重要，不言可知！如果我們能本三民主義的信仰，實現保護工農利益的政綱，不但可以使他們對於抗戰，發生堅決的信念，並且可以根據他們的生活之向上，提高勞動的生產性，以增加生產，充實國民經濟，而彌補因抗戰對勞力的徵發所發生之生產上的勞力不足。他們只顧慮到因大眾生活之改善，會影響不勞而得之收入；却不知這如只顧慮少數不勞而得者的利益，忽視大多數生產者勤勞大眾的利益，無論如何，是一件不智的事。何況在私有制未取消的條件下，不勞而得者之利益，不僅並未根本消滅，且可以他們的損失，轉嫁其他人們的身上，用不着代他們着急！

(九)抗戰中之軍事工業的建設，也很重要。因為在長期抗戰中，軍事上的消耗甚鉅，完全仰給外來，既不經濟，且恐遠水不能濟近火。所以應於軍事工業方面，就原有基礎，加以整理擴充，或創設新的軍事工業，以應急需。此種辦法，尙須仰仗專家的設計，我們當不能在這裏詳細提出。

五。

以上所述，是我對於抗戰中之經濟政策的大體意見；雖然有些近於原則；但如能按照這種原則，釐定具體的實施方案，我相信抗戰中之經濟政策、便可以健全的確定起來，而抗戰中之物力與人力的問題，亦可以得到適當的解決；並且中國經濟生活之改造，將隨抗戰之發展而發達。

現在因實施法幣政策，與管理交通機關以後，對於戰時經濟政策之籌措，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無論是移動資金，或是調達軍費，抑或是統制運銷等等，都易於進行，我希望我們政府，本諸抗戰到底，誓不屈服的精神，計劃實行！

戰時財政經濟問題

黎百強

(二) 執行正確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的前提

在大規模的抗戰已經開始了的今天，一定有許多人擔心着：中國在平時，財政經濟狀況已經非常糟糕，如今大規模抗戰爆發，用錢當更多，物質的需要當更大，政府雖則決定發行五萬萬元救國公債以充戰費，但是這筆巨大的公債能不能順暢地全部推銷，固然是很大的疑問，現在假定這一次公債可以暢銷無阻，可是這五萬萬元用完以後又怎樣辦呢？難道還可以再發行第二次，第三次嗎？還有一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正集中大兵向上海進攻，它進攻上海的主要目的之一，顯然是要動搖南京中央政府的財政經濟基礎，假使在不遠將來，中國金融財政經濟中心的上海和江浙兩省都被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得稀爛，那麼，南京中央政府即使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然而在

財政困難，經濟破產的情形下面，這場惡戰又怎能長期地支持下去呢？

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今天，誰都不能否認中國財政的困難和中國經濟的破產。但是，是否因此就能作出結論說不能與日本作持久戰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以為中國能與日本作持久戰，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今天的問題倒不在於財政困難不困難，不在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有多少成績，而在於比財政經濟更重要的更決定的其他問題上！什麼問題呢？那就是已經形成了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能夠更加鞏固，堅固的民主集中制的國防政府是否能夠迅速建立起來，政府軍隊的單獨抗戰是否能夠轉變為全中華民族的抗戰和人民的生活是否能夠改善等問題。假使這些問題都能够得到肯定的答案，那麼，中國的財政經濟即使困難到萬分，中國仍然可以和日本作持久戰，中國仍然可以取得最後勝利！

但是，在上面的條件實現以後，是否沒有錢也可以打仗，是不是完全不必講求正確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也可以保證戰爭的勝利呢？當然不是的！我們要和日本作持久

戰，並且要保證取得最後的勝利，主要的雖然不是依靠錢，正如西班牙政府軍能長期抵抗國內和國外的敵人，中國紅軍在過去能作戰十餘年而能常常取得勝利，主要的不是依靠錢一樣；但是，完全沒有錢，完全不講求適當的正確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是不行的。我們可以這樣說：上面所說的條件是爭取抗戰勝利的主要條件，而正確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則是次要的條件。雖則是次要條件，但也是幫助和保證爭取抗戰最後勝利所必需的。很明白的，只有實現前者，才能執行後者，又只有執行後者，才能實現前者。前者是前提，沒有前者不能執行後者，或者即使執行也沒有多大效力。更重複一遍說，只有鞏固國內團結，建立民主集中的國防政府，動員全國的人力，使人人都相信政府，人人都能自由參加抗戰，然後才能執行正確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才能動員和增加全國的物力；又只有執行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動員和增加全國的物力，才能使國防政府更加充實，抗戰力量更加雄厚，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更有把握！

(二) 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戰時財政政策？

今天中國應該採取的戰時財政政策的原則，是有錢出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和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

也許有人說，中國人民是沒有錢的居多，你主張有錢出錢，到底有多少錢好出呢？我們以為這話是不完全正確的。雖則我們不能否認中國人民是沒有錢的居多，但是有錢的也不少呢。據專家估計，中國全國人民單在國內和國外銀行的存款就有四十萬萬元以上，僅上海一埠存款已達二十一萬萬元，匯豐銀行存款不下十二萬萬元，其中大部份都是中國人的存款。這些存在銀行的錢，都是中國人民盈餘的錢，在今天個人的生命都可以犧牲，這些身外之物的盈餘的錢，在原則上應該全部或最少大部份要拿出來供抗日戰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當然，目前的問題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政府要用怎樣的辦法才能使他們拿出來的問題。我以為政府可以立刻舉行財產登記，實行黃金和白銀的國有，徵收累進的遺產稅和財產稅，並鼓勵或限令他們多多推銷「

救國公債」，在這時，那些祇願當亡國奴而不願意拿錢的人，自然會把錢通通存到外國銀行去（這種現象在政府還沒有實行徵發以前已經發生，據倫敦電：中日戰爭發生後，中國一部份資本家紛紛將白銀匯往香港等地，準備把家財搬到英國美國去，因而引起銀價的狂跌），這種行動完全是漢奸的行動，政府應該一面下令嚴行制止，一面鼓勵他們「毀家紓難」，捐助抗戰經費。

中國人民除了有錢存在銀行的有產者或小有產者以外，還有一種人是比較有錢的那就是海外的華僑，好在華僑是最關心祖國的事情，而且是最熱心救國的，我們無須強制他們，我們祇要有適當的宣傳鼓動，他們必定願意將大部份或全部份積蓄拿出來。

除了有錢的必須盡量出錢以外，中國還有一筆很大的現成款子，我們變成民主的國防政府可以動用。我們很同意侯樹彤先生關於這一件事的主張，雖然侯先生聲明「不是積極主戰份子」。侯先生說：「我們現存着一大宗法幣準備金，這里邊包括有白銀，黃金及外匯。並且最大部份皆存在國外。這是我民族數百年來刻苦積蓄的一點資

金。幸而早已經集中起來，現在正好拿來作抗敵救亡的本錢！這宗款子，不但數目可觀，最難得的是非常現成，不待臨時張羅。他種款項暫且不必說，祇專談這一宗，我們也儘可以隨着敵人週旋一番了！」（大公報八月八日星期論文）。這一宗款子到底有多少呢？據說，中國全部白銀有十八萬萬盎斯，約合國幣三十萬萬元，這些錢若果用在內戰，我們無疑要堅決反對；但今天是用在抗戰，我們是當然贊成的。

至於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和漢奸財產，不但是一宗很大的收入，而且還可以鼓勵士氣，抗日的政府早就應該實行了。

普通理財的辦法不外「開源」與「節流」。以上都是關於開源的辦法：以下應該說到節流。

說到「節流」，首先要「節」的就是平均占歲出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外債和內債的本息。日本的債款是毫無條件的全部停付，其他友邦的債款我們可以與他們舉行談判協定暫時緩付。單這一項每年就可以省下二萬萬五千萬元以上。此外，南京中央

政府最大的支出是官吏的薪金和公費，現在無疑應該將高級官吏的薪金減低，只支給生活費，這樣又可以省下一筆很大的錢來。

在上面的「開源」與「節流」之下，六十萬萬元的戰費（即十二倍於目前發行的救國公債）是可以籌得出來的。六十萬萬元能够支持好久呢？按照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和歐戰時的經驗，最少當可以支持兩年以上，到了兩年以後我們當然還可以另想辦法。由此可看到，在平時中國的財政是沒有辦法的，但到了全國性的抗戰已經開始了的現在，只要中國能有一個為民衆所信賴的民主集中制的國防政府，財政是不愁沒有辦法的。假如現在還有人以「財政困難」作為中國不能作持久戰的根據，來散佈悲觀失敗的情緒，那無疑又是一種漢奸的理論！

此外，關於財政上的而為大家所注意的幾個問題，還得簡單的談談：第一是發行公債的問題：我們在原則上不反對發行公債，因為這適合於「有錢出錢」的原則，但是過去因為政府發行公債太多了（十八萬萬元的公債與十五萬萬元的利息），所以現

在這方面已不能再存過奢的希望了。第二是通貨膨脹的問題：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通貨膨脹總是對勞苦大眾不利的，但是目前這一着萬一不能避免，爲補救計，我們堅決地主張提高工農勞苦大衆教員和職員的工資，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借外債的問題：在不喪權辱國的條件下，我們也不反對「利用外資」。但是目前可以「利用」的外資恐怕不多。英美兩國是不會無條件幫助中國的。在今天，我們若果希望外援，首先就必須堅持抗戰到底，因爲只有我們堅持抗戰到底，才能博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才能獲得他們切實的援助。西班牙政府軍的戰費不愁沒有着落，大部份是靠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人民的援助，假如中國也想得到這種援助，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抗戰到底！到底，靠自己能够執行正確的，如我們上面所主張的戰時財政政策！

(三) 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戰時經濟政策？

在不久以前，在中國某些地方，曾經發生過富有歷史意義的關於這樣一個問題的論爭：中國應該先建設還是應該先抗日？對這個問題，有三種不同的主張。第一主張先建設，等到建設好了以後再談抗日。第二種主張先抗日，等到抗日勝利以後再談建設。第三種主張在抗日的前提下，提倡國防經濟建設運動，這三種主張到底那一種對呢？第一種顯然是有害的主張，他們不過企圖藉「建設」美名來逃避抗日，他們根本忘記了沒有民族的獨立解放不能有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一條真理！第二種主張的動機雖比第一種純正，但他們却犯了「左傾幼稚病」。他們不了解抗日不是好玩的事情，有了抗日的決心和行動以後，還須有作為真正抗戰準備的適當的建設。第三種主張是比較正確的，但有些地方也未免過於誇大。

這是今天以前的事情。到了今天，全國性的抗戰已經開始了，事實上「先建設還是先抗日」的論爭已經失去了意義；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在抗戰中應該採取怎樣的戰時經濟政策？我們認為在目前還談不上什麼五年或十年建設計劃，但是我們必須有一定

的方針和政策，我們目前所主張的戰時經濟政策是「整頓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農產品的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

首先，我們怎樣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呢？

所謂國防生產，範圍本來是很廣的，一切重工業和輕工業都應該包含在裏面。但是目前首先應該整頓和擴大的是軍需工業或和軍需工業有關的生產，如兵工廠、鋼鐵、燃料、機器和紡織業等。關於這一類的生產，應該由民主的國防政府全部經營或管理，小規模的輕工業和各種小企業也應該由國家統制或盡量參加生產合作的組織。中國的兵工廠原來不多；但是漢陽、成都和石井等地的兵工廠如能加以適當的整頓和擴充，對於目前抗戰械彈的補充也不無幫助。除了原有的兵工廠必須加緊整頓和擴充外，在適當的地點應徵新建設新的兵工廠。中國鐵、煤和煤油的埋藏量是非常豐富的，可惜有一部份已經落入敵人的手中了，我們除了把已失去的努力收回外，長江沿岸的鐵，陝西、山西、四川、雲南、湖南、廣東等地的煤和煤油，應該盡可能開採，並且

應該在產煤鐵的附近，酌量建設若干機器工廠，以製造工業和農業機器。中國的棉紡織業已相當發達，日本在中國經營的棉紗織業尤為可觀，我們對日本經營一切工廠自然無條件的沒收，對中國人經營的也應該由國家統制。

其次，我們怎樣發展農村經濟和保證產品的自給呢？

我們知道中國農村經濟所以不能發展，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兩重壓迫。我們應該立刻沒收漢奸的土地，分給沒有田地的農民耕種；我們更應該實行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調節糧食，賑濟災荒和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辦法。只有澈底執行這些辦法，農村經濟才有發展的可能，農產品的自給才可以得到保證。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想到，發展農村經濟和保證農產品的自給是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也許有人以為在抗戰期中，談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原來國防力量的充實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不衝突的。只有兵士工人農民等的生活得到改善，在前方的才能安心去作戰，在後方的才能安心生產，因而一方面可以

保證抗戰的勝利，同時也可以保證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大量增加，過去中國紅軍的經驗和最近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的經驗，都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此外，組織各種合作社，提倡勞動互助，鼓勵提早春耕運動和多種旱糧瓜菜等紅軍十年來所採用的增加農產品生產的有效辦法，在今天全中國各地都是應該試行採用的。

至於國貨的提倡，土產的改良，日貨的禁絕，奸商和投機操縱者的取締，今天無疑要加緊實行。實行了這些辦法，國防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便可以獲得很大的幫助，便可以不致再有什麼漏洞了。

要執行上面的戰時經濟政策，特別是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一項是要用錢的。這些錢又從那來呢？我認為從前面所說的從「開源節流」得來的錢中，撥一小部份（假定十分之一即六萬萬元）就很有可能了。至於具體的規劃，當然要由國防政府去統籌兼顧地決定。

抗戰過程中的經濟危機與解救

陳長衡

現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人民顛沛流離之際，我們的政府與民衆皆應檢查過去，努力現在，策進將來。方能轉禍爲福，轉危爲安。我們國家民族這次所遭受的浩劫，可謂罕前未有。宋明之亡，皆亡於人口數百萬的游牧民族。除改朝換代之外，我們種族的潛勢力依然存在。故不久異族即被我同化。最後卒恢復了我們國族的自由。至於此次侵略我國的倭寇則爲人口六千餘萬及高度工業化之贊武民族。其野心狂夢直欲剪滅我國家的生存，斷絕我民族的生命。故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莫不兼而有之。其目的在使我們國族滅亡之後永遠不易翻身。其用心之殘忍，計劃之狠毒，手段之武辣，及行動之野蠻，皆無以復加。惟平心而論，倭寇固橫暴已極。我們自己也往往太不爭氣。假使我們的政府和人民沒有種種的弱點，則暴日必不敢對我國大舉入寇及加緊侵略，可以斷言。古人云：「乘弱攻昧，取亂侮亡。」又說：「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又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所以中國今日受敵國空前的侵略蹂躪，推到究竟大半都是我們內部「昧弱亂亡」及「自侮自伐」的結果。我們國族要作持久的神聖抗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非極力補救我們的弱點和培植我們的優點不為功。我們不但應有抗敵的決心，而且更應有抗敵的實力，方能持久。所以我們國族要救亡圖存，起死回生，絕對不可諱言我們自己的弱點，庶可積極加以補救。

就抗戰期中的經濟狀況而論，我們最大的弱點莫如產業的落後與貧富的不均。這是我們內力不充實的一個最大原因。至產業何以落後與貧富何以不均，又大半緣於過去政治之不良。否則必能如革命以後之蘇俄僅用二十餘年的工夫即迎頭趕過英美。蓋自民國初年袁氏亂政之後，軍閥財閥及腐敗官僚相率爭權奪利，暴斂橫征，貪污搜括，中飽營私。遂致國貧民病，四海困窮。即北伐成功國民黨執政以來，政治亦迄未切實修明，澈底澄清。因此一方面阻礙了國民經濟應有的長足進步，一方面更形成了封建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孔子說：「有國有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又

說：「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爲盜臣。」兵法說：「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漏下漏，患無所救。」又說：「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監其內。是謂必潰。」又說：「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孫中山先生說：「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纔是真富。」又說：「中國今日之貧弱皆官吏貪污政治腐敗爲之害。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於富強，實頭頭是道。」最近數年來，中央及若干省區雖有刷新國家政治及改善國民經濟之動機，但徵之實際則許多設施舉措往往仍與政府最高當局之苦心，國家法令之本旨，及一般人民之公意，皆背道而馳。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吾人不得不引爲深憂。現在國家已達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操則存、捨則亡」，「勝則興、敗則滅」，凡負有國家之責者萬不可一誤再誤。方能內固邦本，外抗強敵。否則仍如中山先生所謂「種種作惡舞弊，無一不斷喪國家之元氣，傷殘人民之命脈。」弄到國貧、民貧、兵貧、祇有最少數人坐擁大宗

不義之財。「上富而驕，下貧而怨」，猶不力圖解救民困，加厚國力，欲免危亡，其可得乎。

我們國內的經濟危機既如上所述。何況敵人復加緊侵略，肆意破壞我們的經濟建設，及剝奪我們的土地資源。致國計民生更感窮蹙，國家財政亦更形拮据。故欲抗敵持久，我們今後的經濟設施務須對於國計民生能切實兼籌並顧。經濟的使命原為經國濟民。所以全國的經濟資源皆應善於開發，並為最經濟而最正當之利用，然後國家不虞財政支綱，物力匱竭。民衆亦不致生計困窮，生活憔悴。我們的經濟財政及金融政策皆應以保障國家的獨立自由及民生的暢遂福康為旨歸。各種具體方案雖非本文所能罄述。但其舉要大者至少應包含下列諸端。

一 關於財政者

我們抗戰時期的財政不應專以籌措戰費為目的，並應於可能範圍內力求平均人民負擔。然後全國的經濟力量更能持久。我們的戰時財政支出在中央每日平均約需四五

百萬元。或每年約需十五萬萬乃至十八萬萬元。地方雖無綜合統計，但戰時的財政支出亦當比平時有增無減，自屬意料中事。籌措方法不外以下數者：（一）增加現行各稅稅率，（二）舉辦新稅，（三）募集公債及籌商借款，（四）強制攤派特別捐款，（五）有限制的通貨膨脹。茲略分述之：

（一）增加現行各稅稅率

（甲）關稅稅則因無法普遍提高，不得已僅應增加原裁撤之土貨轉口稅。稅率係定爲百分之七、五，預計每年轉口稅收入不過三四千萬；惟負擔轉口稅者僅爲本國貨物，故一面應力求減少征收機關之苛索留難，一面應取銷各省自征之產銷稅，以免商旅裹足，國貨滯銷。

（乙）鹽稅因海鹽產區相繼失陷，河東池鹽亦岌岌可危。故應迅速獎勵川滇等省之井鹽產製以維民食而裕稅收。每年至少可增加產額三四百萬担。獎勵之法，應一面責成銀行低利放款，一面由政府收買一部份產鹽，存儲備用，以減輕

製鹽成本而調節食鹽售價、一面亦應提高鹽工工資，改善鹽工待遇，以安鹽民生計。

(丙) 統稅中之必需品(如棉紗麥粉等)其稅率多不宜再增。又捲菸及土菸土酒之稅率亦已分別增加五成，一時頗難再增。至地方所征附加稅或產銷稅亦宜一律裁併。

(丁) 印花稅在去年十月已由財政部呈准將法定稅率提高一倍，故亦不宜再加。

(戊) 所得稅中之第一款所得如不易普遍開征，不妨先由公司及錢莊入手；然後逐漸推行於一般商店。又第二類之所得在一萬元以上者宜加高其累進稅率或另征超越所得稅。至於第三類之證券及利息所得，亦可細分為兩子類，對於存款利息所得在一千元以上者不妨酌採累進稅率。蓋第三類為投資所得在理論上原應比第二類征稅尤重，而且征收手續甚為便利也。

(己) 營業稅法雖經財政部參酌地方情形，釐定各省單行徵收章程。但應於可能範

圍內力求整齊劃一，以免過於紛歧。最近如四川營業稅更有改爲中央稅之說，作為抗戰期中之暫行辦法，未始不可。但應各省一律。又營業稅既有逐漸演變爲交易稅或販賣稅之趨勢，所定規章應力免煩苛。如對於肩挑負販等小本營業均應予免，以示體恤。

(庚)田賦除少數之市區或可次改征土地稅外，祇能辦理簡易土地陳報，俾已耕未稅之土地可一律升科，使農地負擔較爲公允，此外並應極力免除預征以蘇民困。

(辛)飲鴆止渴之鴉片非法收入，應毅然決然早予廢止，並提前實行禁絕鴉片毒害，以挽救種族墮落而洗雪百年國恥。倘能改善國民生計，培養其他稅源，則公家財政決不憂不足。

(壬)新稅之應舉辦者莫如遺產稅。關於此稅去年中央政治委員會曾核定有遺產稅法原則。倘能再加一度修改，並制定簡便稅法，擴大免稅範圍，責成所得稅經征機關

妥籌試辦，一時雖不易收效，當於戰後財政不無小補。

(三)募集戰時公債及籌商外國借款其為籌措戰費之重要法門。去年發行之第一批救國公債五萬萬元雖大致認購足額，惟政府實際收得之數恐尚不及三分之二。至於孔部長去年向英法美捷等國商訂之債款或成立之金融協定雖有數起，但借款總數究為若干，及能否以一部份移充戰費或作購械之用，不得而知。將來戰事延長，或須再募一批救國公債亦未可定。又中央政府之內債既經全部整理以減輕國庫負担。後方各省之地方公債亦宜有一度之整理，酌予延長償還期限及減低利息，以減輕地方公庫負擔而舒民力。否則地方債務支出為數過鉅，地方賦稅又不宜增加。預算收支既難期適合，教育建設等費則仍嫌太少，必致公私經濟均日感枯竭也。

(四)強制攤派戰時特別捐款。亦為非常時期籌措戰費之一法。現時銀行存款之提用及外匯之購買均已明定限制，故由財政部主計處及審計部合同調查私人存款及公司股息並非難事。又私有土地之多寡亦大都有地籍可徵。倘能對於一萬元以上之財

產所有人按累進制攤派一次之戰時特別捐，必可立籌鉅款。既符按能力出錢之本旨，復合節制資本之精意。比之多向貧民征稅，固遠勝一籌也。

二、關於金融者

(一)有限制的通貨膨脹亦為籌措戰費之一最要法門。且為發展國民經濟所必需。鄙人前此曾主張應由財政部製鉅額之五角及二角輔幣券，交由中央銀行發行。比之各省各自印發輔幣券之現行辦法實遠較妥善。此種集中發行之輔幣券既可通行國內，並可將各省自發之輔幣券次第換回，以收統一輔幣之效。又此種輔幣之法償額可明定每次最多以五元為限，自不致影響。

(二)本位幣券應由中央銀行依照國家金融政策及國內實際需要，為有條件之逐漸膨脹。可自本年度起在抗戰期間以每年增發五萬萬元為度，以供墊付國家軍費及扶助農工商業之用。因現時中中交農四行之幣券，為數僅十五萬萬元左右，並不算多。況中央銀行幣券之法定準備雖減低二成，仍比多數重要國之中央銀行準備為高。

也。

(三) 統制外匯吾人亦早有此種主張，幸現已實施。此為穩定金融之必要手段。不但購賣外匯應經財政部之核准，即現金現銀之私運出口亦應予查禁。並應繼續收買民間生金銀及銀幣。凡用生金銀及其製成品或用硬幣繳納國稅者，宜參照購募救國公債獎勵條例之規定於折合法幣後，給以百分六之退稅，以示鼓勵，因生金銀之搜集，不但可以充實幣券準備，並可用以向外國購買軍用品也。

(四) 金融機關之放款應受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指導，並依政府之經濟計劃為之。為免除同業競爭及集合全國流動資金為最經濟之利用起見，宜將現有中中交農四行貼放委員會之組織酌予變更，俾其他有充分資本及鉅額存款之銀行均可加入。並逐漸提高中央銀行之地位，使獨任辦理重貼現交發行幣券之責，不必與其他商業銀行爭利。庶使該行更能充分行使法律賦予之特權，而發揮調節全國金融之實效。

三 關於經濟者

(一)今後全國的經濟政策，應依據民主主義及物質建設中所定之大原則及大方針，將全國的經濟事業分兩途發展：一為國家或地方經營，二為私人經營。公家經營之經濟事業，在原則上雖不必以營利為目的，但應力求開支撙節及辦理盡善，如有盈餘，應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以減輕人民之賦稅負擔。否則公營事業愈多，即私營事業愈少。國家稅源既有減少之慮，而營業收入復於公庫無補，則公家財政收入必大受其影響，此應行注意者一。

(二)應由國家經營之經濟事業，非萬不得已，不宜交與私人經營。如因國家或地方資力不足，必欲參加人民股本，亦宜使政府資本遠超過一半以上，並應限制私人投資之紅利以免受私人操縱，又政府與人民合營之經濟事業均應依法納稅，不宜動輒給以種種免稅待遇。此種事業更不許假統制之名，行聚斂之實。反乎此者政府應取銷其私人股本，或懲辦其負責人員。

(三)私人經營之經濟事業，在其正當範圍以內雖應加獎勵，但不宜輕於賦予種種之專利權，以免剝削一般民眾或損害公家利益。

(四)在抗戰時期對於供給有害的或奢侈的物品與勞動之私營經濟事業，均應分別加以取締或禁止銀行貸以流動資金，以免全國的物力勞力及資力投諸不正當之用途。

(五)政府對於物資政策以兼顧消費者與生產者雙方之利益為原則，而加以合理的限制。又對於各種勞動者之工資亦得參酌地方情形為最低工資之限制。又工廠法規亦應逐漸設法推行，以增進勞工之福利。

(六)對於戰時應徵兵役義務者之家庭，應由政府酌予補助。又陣亡士兵之家屬撫恤費亦宜照章核發，不可有名無實。又對於戰區退出之難民尤宜分別安插，俾各盡所能，繼續參加經濟生產。

(七)人民的職業教育尤宜積極提倡，以期增加戰時的經濟生產力。因戰時國家方面消費甚鉅，人民方面亦損失甚大。非提高一般生產者之生產能力，不易使全國人民

之物質供需能彼此適應。

上述各種應有的經濟設施舉措，雖未必能完全解除我們民衆在抗戰時期所遭受的種種艱難困苦，但至少可以使大家的經濟生活更為安定，使大家應得的經濟報酬或應攤的經濟負擔更為公允。使社會最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更能互相調和，而無極富與極貧之患。則全國的民衆必更願為國家出力効忠，犧牲奮鬥。以打倒外寇之堅甲利兵，而恢復我們固有之錦繡山河，此則吾人所敢斷言者也。

最後國防經濟的建設

羅敦偉

最近的全面抗戰已經轉入第二時期。在這個階段中間，中樞各省的經濟建設，不僅關係國民經濟整個前途，而且直接可以決定戰爭勝敗的全局。因為現代的戰事，本來是最後勝負，決於國民經濟的。海爾弗里都說：一旦國民經濟破產，戰爭也陷於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之境，這完全是根據歐洲大戰時候德國的實際教訓。所以蔣委員長說：現代的戰爭，不是這一個國家的政府和軍隊與別一個國家的政府和軍隊的決鬥，而是這一個國家和別一個國家的人、財、物力總決鬥。我國一切建設比較落後，經過四個月的戰爭，當然感到困難，所以今後自經濟建設上培植人財物力，實為當前的一個大問題。

自國民政府西遷以後，沿海沿江許多省區，已經陷入戰區，過去許多工業中心地帶，經濟繁榮地帶，已經陷於生產不可能。因此中區若干省區如湖南、湖北、四川、

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各省，在人財物力的供應上居於最主要的地位，因而這幾省的經濟建設，實為最後支持戰爭的關鍵，也成為決定抗戰的最後勝敗的關鍵。本來中國區幾省的建設，不應該到這個時候才來緊張的。個人在四年以前即已經提出過『國防中心區域統制經濟建設』的主張。並提出『地域集中』和『事業集中』兩個原則。主張有全國性的經濟事態，事業集中，似必要而實非急切必要的建設一律停止。同時集中中國數省實施統制，造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國防中心經濟地帶。假定早就實施起來，何致花費許多民脂民膏，造成一些供敵人利用的建設。又何致抗戰的經濟基礎，感到如此脆弱，抗戰的經濟力量，感到如此困難，我提到過去的主張，並不是說現在應該後悔而竟無補救之道，我的意思是現在應該趕快把上面的主張實行起來。時機已經萬分緊迫，一刻也不可以再行延緩。

此刻當然不能再談理論，應該談到立刻可以實施的方案。立刻可以實施的方案，各省的情形不同，當然不能談得過份的具體。只能說到幾個原則。

第一，不可不行統制經濟，過去我已大聲急呼，即中國應實行統制經濟。可是一半的原因，是真正懂得統制經濟的人們過份的少，大家以為統制經濟不易實行，還有一半的原因，即是以爲實施統制，於富商巨賈有若干的妨礙。誤會以為不容易使資本家就範，這個當然都是誤會。自由經濟在現階段中國情況之下，不易抬頭，是一種鐵的事實，資本家自由發展，在某一個階段，似乎獲利甚豐，可是一遇到風波，即全被破產。總算起賬來，當然是實行統制，比較有利。尤其是現在，固然也許會有若干資本家用某種力量，企圖戰時暴利。可是大多數的資本家如果沒有統制的力量，加以維繫，必然的不會敢於隨便投資。甚至根本不敢投資，使生產沒有方法可有新的發展，換句話，即是各省的新建設，也無從着手。所以必須把一切生產事業實施統制起來。使資源、資本、勞動力、生產標準、生產技術以及運輸銷售各方面，一方按照經濟的原則去發展，一方按照戰爭的需要，使生產與軍需適應起來。統制經濟的不容再行延緩，個人以為這個應該不成爲問題。

第二，應該地理分工而技術合作，所謂地理分工，即是按照各省區地理的情況，把整個經濟建設計劃，部份的負起責任來。例如湖北湖南比較的宜於發展棉紗業，那末，即應由此下手。又比如湖南許多工業或特產，過去已有開發的準備，而因為某種原因停頓起來，即應按照地理上的便利，集中發展。此外，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當然也各自有他的特別容易發展的事業。即應因地制宜，儘量發展。至於技術合作，當然更屬重要。行政上的技術合作，可以避免省與省之間的衝突及一切相互間重複等等弊害。工作上的技術合作我們素來感到缺乏，這個合作，尤其重要，所以地理分工與技術合作，這個我素來主張的老原則，在這時候，正用得着。

第三，行政機構應該有一個新的姿態。我國省行政工作，素來有些嫌緩慢。而統制經濟行政上技術上都比較有迅速而祕密之必要，所以必須另有一種新的機構。有人以為省政府原有財政廳和建設廳，似乎沒有另行設立新的經濟統制機構之必要。其實：（一）統制經濟的實施，不是通常的機構所能担负的責任。（二）財建兩廳通常職

守很够繁雜，戰時更加忙碌。（三）財政建設兩者分開，使統制的運用不能十分靈活。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個人以爲應該施行統制經濟必須另設新的機構，這個新的機構，可以命名爲省經濟局。大致與江西浙江等省的工商管理局相同而實際上利意不一致。各省之間，將來最好另有一種聯絡。並且由大本營調查委員分別予以指導協助，使這個機構更能強化，增大效力。

第四，慎選人才而歸併駐枝機關，戰時有許多地方可以令貪官污吏乘機暴富。事實告訴我們：一種新的經濟建設事業，常常可以便利貪官污吏，不會違犯法律，無貪污之名而有貪污之實。實際上貪污，而名譽上愈廉潔。個人利益增加，當然與禡國病民成正比例，這樣當然不會使建設能有發展的機會。而且所任廉潔，不過爲官吏最起碼的道德，並不是能廉潔即可以盡發展事業的能事。必須真正了解統制的真義和應有的方法。至於五花八門的駐枝機關，不僅浪費，而且最易於妨礙統制的進行，分散統制的力量，當然應該儘量裁撤。

上面四點，不過是建設新省政的經濟建設中間幾個原則，最簡單的原則。詳細的辦法，需要按照各省的客觀事實，為適宜的配備。當然不是憑空可以隨便擬議的。所以本文只討論原則，不涉及實際方案的研究。

最後要說明的，即是自國府西遷以後，內地各省已經成為支持戰爭最後生命線。假定這幾省經濟建設短期間能够趕上一個相當的水準，那末，前方的供給，必定不會過份的感到困難，我們的戰意也永遠不能消除，戰爭必定可以長期的支持下去。如果像現在的情況一樣，一切漫無統制，一切調度定行失宜，一般散沙地各自為政。在全面抗戰的期間，只看見政府和軍隊的活動，看不見民衆和知識份子的活動。大多數人的才、物力都在散漫沒有統制的政策之下，白白地荒廢。那末，戰爭的結果如何，真的不敢說，也不忍說。現在大家要有勇氣，知錯認錯絕對不可以將錯就錯，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即是指明過去的錯處，求得未來的方法。希望有責的人們予以注意。

這篇文章寫完之後，有某專家談及，說過去主張太多，大半不容易實行，此刻戰

況如此，何能談建設，這個實在是不懂『知難行易』的哲學。真正能懂得，又有決心切實去做，決不會不成功的。例如公路網的完成，談何容易，而居然在不花許多經費之下完成了，即是一個例子。所以上面那種說法的信念。我們必須用搶救的方式，趕快完成我們最後國防經濟建設。

速建設西南

董時進

西南本是一個極富饒的區域，而竟成了一個最落後的地方。西南的氣候土質都佳良，農林礦產皆豐富，然而因為從來離開政治文化中心很遠，地勢崎嶇，交通不便，所以人工的建設極少。現在西南既是中央政府駐在地，及抗戰復興的根據地，我們當然不能再把他視為邊陲，漠然置之。

我們為長期抗戰計，已經準備將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完全劃為戰場，這無異把全國各省其他一切的責任都加在西南的身上，這使命是何等重大，若不趕緊把他開發建設起來，如何可以扭當得了。

西南所需要的不止是某一種或數種的建設，乃是建國的一切建設，舉凡農業、工業、礦冶、水電、交通等等，都是很切要的，不過在目前最急需的恐怕是交通，不先開發交通，別的事業都不易辦。所以無論如何困難，必須趕緊把幾條鐵路幹線完成，

並且要想法使其達到外間，而通昆明的路線尤其要緊。

現在東南各省的工廠已經不能開工，正在考慮遷廠的問題，我願意向廠家進一忠告，即是工廠是最容易遭敵人毀壞的，而遷移又是很困難的，既要遷廠，最好作一永久之計，一直搬到西南的絕對安全地帶。西南原料豐富、工價低廉，燃料水力都不缺乏，可說是具備發展工業的要素。製成的貨品，本地便有很大的銷場，順流而下，銷到外省，也極便利。即到戰事解決之後，開設在西南的工廠，在市場上與他處的工廠競爭也要處優越的地位。

西南各省向無剩餘的糧食，現在人口激增，糧食的需要突然增多，供給已很困難，將來戰區擴大，輸出來穀的皖贛湘諸省淪為戰地時，西南在糧食供給上所負的責任更為重大。所以增加糧食生產也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體。好在西南的糧食產量，大有增加的餘地。嚴禁鴉片，改種雜糧，便可以多出鉅量的糧食。川邊及西康還有很大面積的肥美的荒地，必須趕緊開墾，最好由政府籌撥資金，徵調壯丁從事，當不難在短

時期內生產大宗糧食。

西南有好幾種礦產，蘊藏頗為豐富，至今仍是用土法採取。現在無論為取得工業原料計，及為運輸出口兌換他種物品計，均應從速用新式方法大舉開採。

講到水力的含蓄量，西南在全國要數第一，而已經利用的很少。如今到了需要迫切的時期，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應該一鼓作氣，先完成幾處的水電工程。

人事的建設也是很要緊的。西南向來不但在物質上落後，人事上的缺陷也格外多。最近兩年雖說軍事政治略見革新，而一般民眾仍多醉生夢死。鴉片、嗎啡、海洛英等充斥社會，受其害不能自拔者不計其數。如此民眾怎能擔當救國復興的大任。今後必須以極嚴厲的手段，禁絕毒物，禁種鴉片，推行新生活，革新地方政治。

建設事業需時久，見效遲。惟有在絕對安全的地帶從事，方不致有被敵人毀壞或佔用的危險。坦白地說，目前在長江中下游及華北各省只宜做軍事的建設，至於經濟的建設應該在西南去做。所有擅長各種技能及擁有資金的人們最好都到西南去另謀食

展。政府儘可以把戰區及近戰區各省的普通建設事業暫時停止，將建設的人材及設備（無論是原屬於中央或屬於地方的）移到西南，設法使他們工作。如果恐怕解散各省建設機關，歸併人員設備，在事實上或有困難，也可以保存原機關的名稱組織，將他們整個搬去，自成單位，劃定區域，分配工作。例如：甲省的農業，或衛生機關，分配辦某幾縣的農業或衛生。乙省的農業或衛生機關分派辦另外幾縣的農業或衛生。丙省的合作或公路機關擔任發展某區域的合作或公路。丁省的合作或公路機關擔任發展另一區域的合作或公路。由此類推，以至於某鑛治機關開發某處的礦產，某水利機關興辦某地的水利，都一一分配妥當，使得各機關都有工作的區域，各區域都有工作的機關。這樣大致每一行政專員區能有一省的建設力量，收效一定很宏大。至於所需的經費當然不能責原來所屬的省份擔負，也不能全要西南扭負，必須由中央另籌西南建設專款。這樣才算是真正以全國力量建設西南。

西南有那麼大的土地，那麼多的人口，那麼豐富的物產，只要有開發建設的資金

及技術，不難使他在短期內變成現代國家的模樣。那末，即是單憑西南一隅，我們的力量也可以勝過我們的敵人，何愁不能長期抵抗，何愁不能得最後勝利。

戰時工業問題

孫懷仁

把沿海的工業移向內地，這論調在滬戰開始以後，已經引起了一般人們的注意，到這幾天，更已經進入到了實踐的階段了，大小的廠家，祇要還有東西可以搬的，大概都已在積極的準備了，這裏的問題，就是茫茫內地，究竟是應該遷到什麼地方去，總是適宜。

本來，說到中國工業，幾乎已是一個很可憐的問題，除掉零零碎碎的一些輕工業以外，有些什麼國防工業呢？而這些輕工業，又都集中在幾個沿海都市，到今天對外戰爭發生，也就急得個惶惶不可終日。這些不健全的中國工業的情形，自然有其發生的因素，在現在，我們已不必有所論列。目前的要圖，是應該研究如何趕快把這個貧弱的中國工業，轉拗過來，讓牠能適應於抗戰。

爲要解決這個嚴重而又急須的問題，我們以爲應該由兩點入手，一方面是想法子

龍保全目前這貧弱的工業基礎，利用之於軍需；另一方面是以最大的努力，趕緊建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國防工業。這兩點，可以說是問題的兩面，單有一方面是不够的。同時，這兩方面又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計劃，然後實行起來纔會發生效果。這一個統一計劃的樹立，我們覺得有下面這三個最基本的問題，是應該首先解決的。（一）我們要生產些什麼？（二）在什麼地方生產？（三）如何生產？這三個問題，可以說是目前決定工業計劃的骨幹，這不問對於新國防工業的建立，或是對於原有工業基礎的保全，都具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換一句話說，這三個問題假若不解決，新工業的設置固然不易着手，就是目前盛唱的沿海工業移向內地，也就無從實行。即以上海一地而論，工業既不僅一種，大小廠家也有數十百家，說到遷移，自然不是一句話可能辦得到的，那些工業應該先遷？那些工業可以後遷？那些工業應該遷到什麼地方去？那些工業又應該遷到另一個什麼地方去？倘若這些問題不解決，祇是亂遷一番，那不僅是不經濟與不合理，甚且對國防上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的。

關係那三個基本的問題，一切詳細的與具體的計劃，事實上有關國防的機密，我們未便公開的有所發表，不過對於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原則，我們似乎不妨提出些意見來說說，這個假若可以作為政府的參考，固然頂好，否則，也許會因為這粗淺的意見，引出了大家更精詳的方案的。

(一) 現在我們要生產些什麼的這個問題，不消說最重要的是軍需品，其次就是動力運輸器械，原料機械及半製品等。現在我們的抗戰，大都限於陸地，因此，所謂軍需品可以說是下列的幾種，即兵器（機械兵器及化學兵器）、飛機、彈藥、軍用燃料、被服及糧食、軍用建築材料，軍用衛生材料、獸醫材料、軍用通信用物件，以及修理上述各項物件的材料、器具、設備。這些東西之中，除掉飛機及新式兵器以外，勉強都還可以「急時抱佛腳」的。現在全國所有兵工廠，大部份在內地，步槍、機關槍、彈藥的製造，大概可以不生問題，這裏要改進的，就是加大生產的能力。其他有些軍需品的製造，一小部份可以用原有的工廠，一部份可以把類似的工廠改造，為符

合這個目的起見，我們對於沿海已有的下列各種工業，主張首先遷移：（一）機械工廠及翻沙工廠，（二）化學工廠，（三）纖維工廠，（四）製藥工廠，（五）電器工廠，（六）賽璐珞玩具工廠（可改作炸藥）（七）棉毛織物工廠，（八）麵粉工廠，（九）水泥工廠，（十）火柴工廠。此外，在最短期間以內要新設的工廠，也還很多，主要的如通信及交通機械製造工廠，電線製造工廠，硬化油製造工廠，代用燃料製造工廠，鍊鋼工廠等，這些都是與軍需有莫大關係的。

（二）關於工業的地域問題，一般的講來，自然必須要符合幾個條件，第一個是要原料取給便利，第二個是要交通運輸便利，第三個是要勞力獲得能充分。這三個條件，在今日抗戰的時候，我們自然還須顧慮，不過，我們不能同昇平的時候一樣，可以慢慢的分散的選擇。換一句話說，我們對於地域的選擇，不但要符合這三個條件，而且要符合便於統制的一個條件。因為戰時的工業，第一要適應於國防，至於個人營利的打算，是要置於次位的。在這裏，我們主張把全國劃成幾個工業管理區，而這個

工業管理區，又必須與軍需區域有着密切的聯繫。在一個工業管理區中的工業，分為兩類，一類是因為特殊原因（如因原料關係或技術關係等）的特有工業，另一類共通工業。這種共通工業，平均分散於各工業管理區，這樣不但可以就近供給產品於各軍需區，而且也可以避免集中的爲敵人所毀壞，同時每一個工業管理區，可以設立一個管理機關，分配各項軍需品生產量於各工廠，這樣使生產量既不會不足，也不會過剩。這樣的工業管理區決定以後，新設工業既可分地設置，而今日的沿海工業也可按着計劃，分別遷往各區。

(三) 第三個如何生產的問題，內容應該是包含：原料、機械與勞力的三部份的問題。關於生產原料的問題，這在現在的確是一個很困難而又嚴重的問題，海岸既已被封鎖，所以已不能全靠輸入，因此目前所可挽救原料恐慌的，只有三個方策，第一是趕緊統制現有的原料，視需要的緩急，採用分配的優先順序制度，把原料的使用，可以分爲甲、乙、丙三級，甲級是指直接用作軍需品者，乙級是間接用於軍需者，丙

級是用於無關軍需者，於是，原料使用時，就按級分配，先用於甲級，甲級有餘用於乙級，乙級有餘用於丙級。第二是利用廢物，如破銅爛鐵的重容，舊橡膠物件的製造「再生橡皮」，同時，還必須使用代用品，譬如以酸化鐵，鎳等代白金用爲接觸劑；以空中淡氣所製阿莫尼亞代智利硝石爲硝酸原料，以鑄鋅綿代用石綿，以過氧化氫代石炭酸用於醫藥；以木炭代汽油爲汽車燃料，以頁岩油代重油；以絲代用羊毛，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也能幫助解救原料恐慌。第三是獎勵自己生產原料。這裏，關於農產品的原料，我們還可以不生問題，問題就是在礦產的生產，尤其是鋼鐵與燃料，現在為獎勵生產起見，對於人民的開採煤鐵礦，不但應該像目前政府的給予以保息，同時，對於開採資本，政府銀行在可能範圍內，亦應設法給予以金融上的便利。而且，中國目前已在開採的煤鐵，更應該即速擴大其規模。關於機械的問題，正同前述的原料問題一樣，全靠輸入是有些不容易了，因此，目前除掉必要而大規模的機械，無論如何只能靠輸入外，其餘的一切機械，應該趕緊自己來仿造，即令成本高一點，也

沒有辦法的。此外，假若以手工可以代替機械的，那我們應該盡量利用低廉的手工，這樣結果反可以經濟些。關於勞力問題，目前抗戰中人民正向後方移動的時候，祇要政府能有計劃，隨處都可以集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現在各都市熟練工人撤退的時候，不要讓它們分散，應該集團的向後移。像目前上海的遣散難民，就根本沒有注意工人不應分散的原則。這裏，不但埋沒了許多有用的勞力，而且也根本不是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

以上所說的三個問題，祇是今日戰時工業中最基本的幾點，此外，自然還有着很多的問題，譬如說：（1）工業技術人才應該如何集中？（2）如何獎勵促進中國工業的技術？（3）戰時工業的規模應該怎樣纔是適宜？大規模呢還是小規模？（4）沿海都市工業移動時的交通問題，應當如何配置？（5）將來被敵人佔領之地的工業應如何破壞？這種種問題，目前也趕快要有一個決定纔是。

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

新華日報

「沒有一切新式國防武器，沒有這種武器，國家的獨立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武器，國家就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中國沒有重工業，沒有軍事工業，只要不是懶漢，誰都去啄食他。」五年前，世界偉大的政治家斯達林曾經這樣地說過。五年後，在反抗日寇的堅決的戰鬥中，我們前線幾十萬將士及我們民族的每一個人，從切身的經歷和苦難中，深切地領會了這個偉大的真理。

半年來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爲着戰勝強暴的日寇，我們需要有強大的國防工業！戰爭一經爆發，我們一切政策的基礎和出發點，就應該是一切爲着前線的勝利。強大的軍需工業，國防工業，就成爲一種最必要與最急切的東西。爲着鞏固我們的前線，我們需要保證前線部隊軍火及一切物質資財的補給。爲着創造新的軍械和預備軍師，我們更需要大量的新式的國防武器。爲着在技術上及戰術上提高我們部隊的戰鬥力

，我們需要把我們的部隊以現代的武裝裝備起來。總之，爲着戰爭的勝利，我們需要飛機，需要裝甲車與坦克車，需要重炮與高射炮，需要增加重機關槍自動步槍與步槍刺刀，需要無數的子彈、炮彈、炸彈——使我們的軍隊有源源不絕的軍火的供給；使我們的軍隊有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這是爭取戰爭勝利的迫切的要求，這是前線將士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呼聲！

可是戰爭勝利需要的大量的軍需品從那裏來呢？從國外購買自然是臨時的應急的一種辦法。但是爲着我們民族的永久的前途及爭取當前勝利，我們都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國防工業，當着許多重要的海口陷落，國外的輸入遭受着種種阻礙的今日，這個任務成爲更加嚴重與迫切的了。沒有相當的建設工作，就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而在戰時的一切建設，也絕不能脫離爭取勝利的最高原則。因之戰時的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建立強大的國防軍需工業！這是當前經濟建設的中心樞紐與中心環。

中國的經濟上和技術上的落後，國家的貧弱，長期對國防力量的創建的忽略，戰時的環境，都使我們在解決這個任務上發生許多的困難。但是絕不能說我們因此就沒有任何可能與基礎來建立強大的軍需工業。中國雖然落後與貧弱，可是我們有着許多工廠、機器設備、原料，有着必需的技術幹部和熟練工人；有着廣大的安全的後方地區，我們有着充分的可能來建立起我們強大的軍需工業，用以供給戰爭的需要。問題是在要能够堅決的迅速的切實的不倦怠的組織計劃領導和實施，問題是在要克服目前對這個問題的缺乏計劃與冷淡的態度。在這種缺乏計劃缺乏組織與不够積極的情況下，多少珍貴的機械是擋置着，多少熟練的工人技師工程師是閒散着，多少天才的發明家是埋沒着，而我們的前線又是如何地急切需要軍火的供給啊！無論如何，須要消除這種缺乏計劃缺乏組織與不够積極的現象。無論如何，須要立即着手整理發展我們的國防工業。我們主張採取如下的初步步驟。

第一：充分的應用現在的工廠，提高他們的生產率；

第二：迅速的運輸從江浙和山西等處遷移出來的工廠的機器裝備至安全地區並於最短時期中開工，不使他們再有一天的擱置；

第三：收集一切閒散與流亡着的熟練工人，技師，工程師，有計劃地分配於現有各個工廠或建設新的工廠；

第四：在統一的計劃之下，在西北和西南各省建立新的國防工業的工廠，首先是製造飛機坦克車的工場，并使在短期間後，能够自己製造這些新式武器；

第五：提倡獎勵各種加強國防力量的發明與建議；

第六：統一與加強有關國防工業領導的各種機關，使一切工廠能夠在國家的統一計劃下工作；

第七：購買儲存一切必要的原料，及今天還無力自己製造的機件，以保證一切軍需工業不間斷的工作。

以上所述自然都是些最初步的步驟，然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步驟，因為祇有經過

這些初步的步驟，我們才能創立由政府統制的強大的國防軍需工業——才能够達到戰時經濟建設的根本課題——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後方工廠應籌設研究所議

吳世昌

我在此刻提出這樣一個建議來，恐怕有許多人認為迂闊無當而不切實際。但我們必須痛切認清：中國目前的抗戰奮鬥還只是開始，今後的艱苦還要更大更久；而目前的苦痛危急，却完全是因為「現代化」不够；說得具體些，是工業化不够，科學化不够。就其切近者而言，大炮飛機，自己不會造，買來的東西，或則射程速度不如人，或則器具雖好而不善應用。——此外種種，暫時不說——所以抗戰失利的痛苦和羞辱，直接間接，都是科學化不够的切膚教訓。

中國提倡科學，自清末以來，也已近四十年，而成績這樣差，原因果然有許多，而其最主要者則因大家只知生吞活剥的摹倣，現成享用，而不肯切實研究，因此沒有研究的環境，許多在外國學科學的人，回來除了教書以外，幾乎無法繼續工作，所以有的改行，有的在外人機關中工作。而教書者往往仍不能做研究工作，因為永遠教幾

本淺近的課本，等於自己再溫習幾遍大學的課程。直至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才有兩個國立研究院，幾處大學附設的研究所。我們知道西洋先進國家科學的發達，並不完全靠政府的提倡培養，實由於社會組織的關係，工商業本身的要求。他們較大的工廠都附設科學研究機關。事實上大學裏教授的額定是有限制的，每年畢業出來的科學人才，大多數要靠工業界來吸收。所以他們的工業永遠改良，永遠進步，科學上也永遠有發明，有創獲，二者互相啓導，互相催逼。不但工業界如此，連大公司都用重金聘請科學人才來指導業務，美國的著名心理學者桑戴克曾經就聘某公司為心理測驗員。科學的理論和實用，如此循環推進，交互啓發，國家跟着進步，文化因之提高。中國近幾年科學界的 effort，已經逐漸有了基礎，有了成績，本年七月某日的倫敦太晤時報尚有專論推舉中國近年科學的進步。但是我們看到暴日這樣摧毀中國文化，二十幾個大學和僅有的兩個研究院都被摧毀而陷於不能工作的狀態，所有研究環境幾乎全被破壞，我們不能不為中國科學的前途憂慮。政府現在正以全力應付軍事外交，我們果然希

望他們能兼顧學術工作，但如爲事實所限，難於兼顧時，我們不能眼看這點科學的幼苗任其萎折。現在如不設法保育，這樣長期抗戰下去，所受摧殘將難於恢復。因此我以爲後方各大工廠應趁這時期設立各就該廠需要的研究機關。這個制度如能實現，對於國家前途貢獻極大。

第一，先就工廠本身利益而言，至少有三種好處：（一）在出品方面可以不斷的改良，技術上可以進步。這是顯而易見，無待詳述的。（二）可以有各該廠出品中附帶品的發明和創造。在不設研究所的工廠裏雖然也有工程師和機器師，但那些只是技術人才，其工作呆板而限於工廠方面所派定的，不像研究人材可以有比較自由的研究。我們知道科學的發明不比出題作文，有許多是在研究過程中偶然發覺的。（三）整個工廠可以增加效率。如果工廠的製造部份有了研究所的幫助，一切科學化了，則別的部份——如管理部份、發行部份等等——一定也要跟着科學化，才能整個適應。在效率方面一定會隨時發現缺點，隨時改進。

在歐戰期中西洋人無暇東顧，中國工業界本可乘機興起，但因當時工業界領袖眼光短淺，不知道研究工作的重要，不知道澈底科學化的重要，所以雖然糊裏糊塗的繁榮了一時，待戰後歐人回戈東向，終於一敗塗地。個人固然身敗產破，國家所蒙損害尤大。所以此刻如肯化一筆經費辦一個研究所，一時雖然增加負擔，但將來收利必鉅，其功用等於投資。

第二，中國如望復興，必須工業化。因中國每人只能分到三畝半田，永遠做農業國非滅亡不可。現在這一戰是存亡關頭，敗固不堪，勝利也如大病獲愈，百廢待舉。樹立戰後工業基礎，必須預先培養訓練科學人材，而這件大事業，為工業界自身設想須他們自己擔任，即為中國前途計，就全國目前的經濟情形而論，也只有工業界才能擔任。

第三，後方的工廠在這時候設立研究所，雖然有許多不方便，但有一個最大的方便，是平時所絕難得到的機會：便是聘得到人。在平時中國的科學人才大都為各大學

所吸收，工商界要聘請很困難。自經此次抗戰，國內重要的文化和工業大都市慘遭淪陷，有多少大學教授講師及助理流亡失業！雖然有臨時大學或原校遷移種種補救，但因各項原因，失業者一定還是很多。（即使不失業，也因缺乏儀器圖書而無法工作。）這情形如再繼續下去，文化界的失業將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工業界如趁此時機創辦研究所，吸收大量科學人材，不但爲中國工業界本身闢一個新紀元，同時還替國家保存元氣，奠定戰後復興的基礎。

一般人也許以爲創辦研究所是一件大事，須在社會安定時舉辦，在這危急之際，人力財力都不易從容籌辦。我以爲這也是不正確的顧慮。大凡「革露檻裸以啓山林」的事業，開始時儘不妨因陋就簡，漸求充實。科學研究的事業，有許多確須充分設備，有的却可以因勢利導。舉一簡單的例：我們平常吃的罐頭牛奶，上面常有英文「消毒」字樣，這是法國大科學家巴斯德發明的消毒法。稍具科學常識者都知此法很簡單，當初巴氏也不需要多少儀器設備，而一經發明，後世受惠無窮。只要肯誠心幹，就

工廠現有的設備試驗研究，逐漸補救，將來不愁沒有成就。

我現在提出這建議來也許有人以爲太迂闊，但是真正了解中國問題者必有已嫌太遲之感。然而及今不圖，以後真要來不及了！希望工業界有遠見的領袖們和教育實業部諸部長切實籌劃一下。至於有關係的機關如實業部、鐵道部等是不是應當裁去許多不相干的冗員而利用現有的文獻和統計材料來辦一個相關的研究機關，也是應當同時顧到的。在這裏不過是個原則的提議，詳細計劃有待於專家的討論。作者人微言輕，只有希望有力者能考慮籌劃，不勝大幸！

戰時金融政策之缺陷及補救方法

衛挺生

此次對日抗戰，爲對暴日數十年來侵略之總清算，舉國上下，完全一致，以爲欲救亡圖存，非以全力抵抗日本不可。在目前之國際情勢下，吾國在道義上所獲得之同情，已足使敵人氣餒。加之以吾忠勇將士無論在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均已表現忠烈之戰績，使敵人對吾實力自認估計太低。吾民族武力在最高領袖有計劃之準備下，近數年來已有突飛猛晉之進步。此次，淞滬抗戰，歐西各國人民與軍事專家亦莫不異口同聲，讚美吾軍不止。可見最後勝利必屬於吾，毫無疑義。惟吾人於此所應注意者，現代戰爭爲實力戰爭，爲全民戰爭。必須傾注全力，持之以恆，始能發揮民族武力之最大威能。所謂全民戰爭，乃在全體人民各於其本職範圍內盡最大之努力，尤其生產方面，格外是與軍事有關之各種生產工作，須平均爲最大限度之擴展，始能適應現代戰爭之空前消費。而生產事業之擴展，端賴有良好賢明之金融政策爲之推動，庶幾

能有彼此適應而無偏枯之弊。

淞、滬抗戰發動後不久，財政當局核准上海銀錢兩業所擬救濟戰時金融辦法，限制提取存款。結果於防止資金逃避，物價高漲與金融機構之發生破綻已有相當成效。

惟此種辦法雖經後來修正，對於三百元以下之存款不再限制，似究屬偏於爲銀錢業着想，而對於生產事業之利害顧到較少。該項辦法對於工廠必須支付之工資等雖有例外規定，但究嫌不够。現在戰事愈趨愈烈，各種工業農業必須立即以金融力量使之活動，方能使購買力提高而工農業不致崩壞。吾人均知今年農作物豐收。棉花米糧之產出，據最近估計，爲近年稀有之豐收。棉業統制委員會最近調查，今歲全國各地棉花生產估計有一千九百六十六萬担，值國幣八萬萬元。稻穀產量亦較往年爲多。產米之區，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各省，估計產量亦有八千萬担，其所值當在八萬萬元以上。如此豐富之物產，乃抗戰中至可寶貴之力量，極應重視。工業方面，各種工廠以沿海各埠爲最多，現以戰事影響，大多陷於停頓。沿海尤其上海各種工廠之應

如何遷至內地與內地各種工廠之應如何充分擴展，雖有待於整個計劃，而對於現尚維持之各種工業應如何使其能充分發展，實為限制提款以後所亟應注意者。此二者為該抗戰力量之雄厚計，固皆應於最短期內決定金融政策以為調劑，而斷不能遷延不決，致誤事機。

依照目前辦法，三百元以下之存款雖已不加限制，任聽提取，然三百元以上之存款，則仍舊每星期只能提一次，每次只能提取二十分之一，且最多每次不能超過百五十元，期限未免太長。三百元以上之存款屬於私人者固屬不少，然究以屬於工商業者為多。上述限制提款辦法對於私人已難能達到限制消費之目的，而對於工商業尤未免有令百業停頓，生產減少，馴至人民失業日增，引起嚴重之社會問題，影響整個抗戰力量，此現行調整金融辦法之弊一也。

由上述弊害必產生人民收入之減少甚至全無收入之後果。工商業停頓於國家稅收本已有嚴重之影響，若人民之收入減少甚至變成全無，則人民担负各項平時稅賦之能

力已陡見減削，遑論再令其担负各項戰時稅捐與巨大之戰時公債。故戰時財政必蒙莫大之惡影響。此現行調整金融辦法之弊二也。

準是以觀，現行調整金融辦法之效用祇爲維持私家銀行錢莊之不倒，而國家財政，國民經費，胥蒙莫大之害。在戰事初起時，公私銀錢之須以革命手段加以維持，俾整個金融機構得從容調整而不生裂痕，因而使整個經濟組織不致崩壞，自爲必要應採取之步驟，於抗戰有莫大之潛益。但金融機構既經維持完整以後，必須切實調整而於短期內採用兼籌並顧之辦法，使金融與經濟方面同時能維持，共存共榮，始爲聰明之政策。否則若僅爲限制消費與防止資金逃避，則均有其他方法更少弊害：如統制匯兌即可防止資金之逃避，統制消費物品即可限制消費。何須用此弊多利少之限制提款辦法，而使經費財政兩蒙其害爲哉！若爲維持銀行之不倒計，吾人以爲其辦法之更簡單者，莫若由中央銀行接受銀行借款票據，貼現發鈔，以爲救濟，自可應付不窮。大不必用此限制提款之笨法也。

然則如何活潑生產之金融乎？此事亦甚簡，即充分利用生產事業之長期票據以爲借貸及發行紙幣之根據。凡各銀行對於工、商、農業確爲生產之用或有確實貨品作抵之借款票據，得以之向中央銀行重貼現。中央銀行則依據此項重貼現票據而增發鈔票。迨各銀行向中央銀行償還此項票據到期之款，則增發之鈔亦即隨之收回。毫無通貨膨脹之弊而有活動金融促進生產事業之利，洵爲非常時期充實抗戰力量急要之措施也。中、中、交、農四行誠然已奉命組織貼放委員會對各地之生產事業放款，然其貼貸範圍尚嫌太狹，杯水車薪，不足以濟全國生產之需要。矧全面抗戰，消費激增，更非有計劃地擴大放款範圍，無以應戰時消費之需要也。

歸納言之，目前金融政策應以下列二者爲重要目的：（一）增加國家資源——獎勵生產，（二）增加國家財源——增加國民財富。能達到此二項目的，始可以言全面抗戰與持久抗戰。欲達到此二項目的，其方法祇要能充分利用票據——生產事業之借款——依前段所述辦法，用作發行紙幣之準備，使發行與生產之需要完全相應，同增

同減。在白銀國有之下，此種辦法斷無引起擠兌之弊，故吾人儘可放手行去。

或謂此種辦法將使（一）國際匯兌低落，（二）國內物價暴漲。作者以爲所慮雖是，亦無妨礙。蓋依此辦法，貼放之款一經償還，增發之鈔即回歸銀行，與硬性之貨幣膨脹不同。此種辦法增發之鈔極有彈性，隨生產需要之大小而增減，不若硬性貨幣膨脹之無彈性，隨消費需要以與日俱增，且有增無減。縱使國際匯兌低落，國內物價增漲，其程度亦必有限，其來勢亦必不猛。吾人爲未雨綢繆計，更不妨預採防止辦法，使國際匯兌不致大落，國內物價不致大漲。

欲防止國際匯兌低落，其法不一，最簡捷有效者莫如統制國際貿易或統制國際匯兌。匯兌統制各國行者方法各殊，吾國目前祇須行比額限制制或稱定額分配制。此項方法，自匯兌方面言，爲匯兌統制之一種，自國際貿易方面言，即貿易統制是也。其法對於各種貿易視其對於國家經濟上之需要與對於戰事之上必需，有計劃地規定比額，賦以購買外匯之權（軍需品之購買自屬例外）。各業比額由各業公會聯合支配。並

由政府核准，以免各廠業務之偏枯。外國銀行之外匯，除正金等日本銀行外，如由吾財政當局與之磋商，將其外匯悉轉由吾中央銀行統籌支配，即以其過去數年外匯平均數額在全部外匯中所佔百分數為比例，分配盈利，使各外商銀行之利益無損，則外商銀行當可樂從。至於日本銀行方面則可以不生問題，目前正可與日本經濟絕交，斷無再向日本銀行購買外匯以輸入日本貨物之理。此關於防止國際匯兌低落者一也。

至若防止國內物價暴漲，則統制經濟足以達到目的。吾國統計不完備，因而統制經濟比較困難，固係實情，但各種主要生產事業之調查大致尚屬可靠。祇要急起直追，先從主要者入手，次及其他，為計劃生產。將各種生產事業之產量詳定比額，使各種產品數量彼此適應，無偏多偏少之弊而於消費方面為計劃消費，按地按業按人口等詳定消費比額。再從而將各種物品價格參照戰事爆發以前之物價水準，規定標準價格，而以金融政策，勞工政策等為維持此項標準價格之手段。此三者如能同時實行，物價必不致暴漲。此關於防止物價暴漲者又一也。

誠能依照上述計劃，以全國爲範圍，逐一辦到，則經濟生產可以大增，而發行因有自然限制（不用時會自然縮減），祇有使金融活潑而無通貨膨脹之弊，不僅可使抗戰力量日趨雄厚，且可使國民經濟之基礎反因抗戰時之嚴密組織而日益趨穩固也。轉禍爲福，在此舉矣。

戰時財政與『合理負擔』

千家駒

自抗戰進入新階段後，有許多問題迫得我們不得不去正視去解決了，戰時財政問題即是其一。救國公債之所以停募，決不是說政府的財用已經非常充裕，不再需要人民的輸將，而其真實的原因怕還是在募集方法上講求未周之處，以致流弊叢生（聞某省認購救國公債一千萬元，而其灘派之法為每畝田加賦四分，僅這一項已可得四千萬元），中央微有所聞，故毅然明令停止強迫派債。但抗戰後六個月來因關鹽統稅收入的遞減與軍事費支出的激增，中央及各省地方財政的枯竭，以及人民在『為抗戰而犧牲』的前提下，率索斂賦，幾至竭澤而漁，這些都是不容諱言的事實。如何籌措戰費，如何使我國財政支持這長期的抗日戰爭，這當不僅是財政當局苦心焦慮的問題，也是每個關心抗戰前途者所要急切知道的問題。

關於戰時財政，學者們的討論，刊物上的新著，已經發表得很多，大家的意見雖

有參差，但應把戰時財政建築在「有錢者出錢」這個原則上則是一致的。不過如何才能使有錢者出錢呢？當然中國最有錢的人首先是大都市中把錢存放在中外銀行的顯官巨宦，次之便算是內地的豪紳地主。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載東方雜誌三十四卷新年號）曾經主張政府徵收財產特捐以充戰費，這種財產特捐是強迫徵收的，即按各人的財產額分別課以累進的財產捐，這是一種極合理的「有錢出錢」的負擔。有人說財產特捐之徵收不難，而財產之調查實難，如何解決財產的調查困難呢？我曾經說：「財產的普遍調查，無論在平時或戰時本是極困難的一件事，但在民衆組織起來以後，由他們自己來舉行，則輕而易舉，且確實而可靠，無論怎樣狡滑的豪紳地主的資產，怕也不能逃避多數窮苦民衆的耳目。逃避與隱匿在平時本是防不勝防的，但在民衆嚴密的監視之下則可能予以防止。自然，通都大邑的富商大賈，因有外國銀行爲尾閭，大批資本的逃亡或許不可避免，但這種逃亡當戰爭一開始就會發生；而當戰爭進行後，中國的通商口岸如不爲敵人所佔領，勢必爲我國行政勢力所統制，這時資本逃亡外

國的事倒是可以防範。所可能的只是內地的逃亡或隱匿與讓與。這種逃亡與隱匿是祇有民衆的力量才能防免的。』這一段話是在抗戰發動前八個月寫的，關於資金的逃亡，不幸早已經證實了，聽說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至滬戰一月中，上海之以法幣購買外匯的（這大部份可視為逃亡的資金），即達二三萬萬元以上之巨。但至今財政當局對外匯仍沒有嚴格的統制，這不能不說是件憾事！至於內地的富戶，亦因為我們始終沒有執行『有錢者出錢』的原則，以致戰爭的一切負担都完全擱在貧苦民衆的身上，一般民衆既出了力又出了錢。而許多不肖官吏和土豪劣紳反乘機搜括，漁利中飽，逼得民衆不是逃亡便變成了漢奸，這類慘痛的事實，舉不勝舉，真令我們無限地痛心。至於有錢的富戶呢，雖然他們在戰爭中沒有對國家貢獻其最大的財力，但在淪於戰區的地方，除一小部份甘心附逆，變成漢奸的以外，還不是一樣的流離失所，逃亡他鄉，而將他的財產委之於漢奸之手，資敵人的利用？他們在當時雖沒有『有錢出錢』，但到頭來還不是一樣的同歸於盡？所以不實行『有錢出錢』，不僅對國家民族足以削弱

抗戰的力量，對富人窮人也同樣是一種不合理的損失。

如何才能使『有錢者出錢呢』？我認為山西所實行的『合理負擔』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合理負擔』在閻錫山先生號召之下各縣成立抗日經濟委員會，按照省府所規定合理負擔的條例，將全縣民衆分作三等九級，攤派抗日經費。將來則要按照各家的財產，每年的生產額，除去必需的生活費外，就所餘部份的多少而依累進法攤派。不過這種『合理負擔』是祇有民衆有健全組織才能實現的。這不僅是因為財產之調查祇有民衆之公開檢舉，嚴密監督才能舉行；而且更主要的是中國的鄉村行政一向是操縱在鄉村長或保甲長手裏，這種鄉村長或保甲長雖然不是全體但至少也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這一鄉村中較有資產的豪紳或地主；政府無論是派丁徵稅，都必須假手於鄉村長或保甲長，因為他們是地方行政最基層的幹部，但如果民衆沒有民主的組織的話，那麼誰能保證鄉村長不把自己應有的負擔轉嫁到一般鄉民身上？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漁利中飽？更誰能舉發他們自己財產的逃避與以多報少呢？無論立法是如何的合理與公允

無論上級政府是怎樣的精明，假如沒有民衆自己組織的監督，『合理負擔』也終於無法真正『合理』的執行。政府任何的良法美意，經過了胥吏豪紳數千年來傳統的舞弊方法，一轉手間對於民衆都會變成了『擣取人民』『魚肉人民』的苛政！但祇要民衆有健全的組織，高度自覺運用其監督權，土豪劣紳就不但失去其漁利中飽的機會，而且也不能逃避他自己應出的負擔，因為他要那麼做的話，民衆立刻可以告發他了。

聽說山西的『合理負擔』，在目前的確已漸進於『合理』了，為什麼？因為山西的民衆已經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已不是從前那種自上而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官僚組織，而是自下而上的自發的民主組織，也祇有這種組織才能使民衆覺醒過來，團結成真正的民衆力量，自動運用其天賦的民權！這不能不說是抗戰中極大的一個進步。我們認為這種『合理負擔』不僅可行之於戰區，而且亦可行之於非戰區，不僅在抗戰前方的山西要實行，即為抗戰後方的省區更應該實行。為什麼呢？這理由是簡單的，因為抗戰期間財政的困難，戰區與非戰區是一樣的，而且祇有非戰區經費

的籌措才能供給並解決戰區財政的困難，如果我們認山西的『合理負擔』是最公允的『有錢出錢』的籌款辦法，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在他省倣效呢？第二，我們認為祇有有錢者拿出錢來，有力者才能心甘情願的出力。過去各地無錢者既出力又出錢的辦法，祇會迫使一般民衆走上逃亡的路，走上漢奸的路。我們此後欲支持長期抗戰，非根本改變舊方式不可了，而山西省的『合理負擔』，我們認為是『有錢出錢』較具體的實施方法，祇要有錢者得有『合理負擔』，有力者誰個不願意出力呢？

但『合理負擔』必須配合以民衆自身的健全組織，即政府規定一『合理負擔』的條例後，由民衆以高度的自覺性幫助政府來執行，這才不至流之於空言。否則，『合理負擔』與『有錢出錢』終不過成爲紙上漂亮的名辭，終無法可以發現的！所以自覺的民主的民衆組織是實行『合理負擔』的先決條件，我們站在戰時財政應該要『有錢的出錢』的見地，也非要有民主精神的民衆組織不可。

一月三十日桂林

論戰時通貨膨脹

伍啓元

自從戰爭發生以來，許多人都關懷着中國的通貨。中國應否實行通貨膨脹呢？戰爭是否必然地引來通貨膨脹呢？通貨膨脹的結果是怎樣呢？這些問題，差不多每一個關心戰時經濟的人都在發問着。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 我們以為溫和的通貨膨脹是不能避免的——溫和的膨脹所以不能避免，主要的原因是財政上的困難。中國戰時財政有兩個大的問題，一是如何籌足外匯來給付外國軍用品的輸入，一是如何支付國內的經費。關於前一個問題，因為外國同情的幫忙和我們白銀的出賣，已有相當的解決。後一個問題表面上雖然沒有前一個問題那麼重要，但事實上則解決却比前一個問題來得困難。這次戰區在我們沿海各省，而沿海各省又為我們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現在稅收主要來源的地方，或則淪陷敵人的手中。

，或則感受戰爭的威脅，所以財政收入不能不大為減少。收入減少了，戰費却增加了，而救國公債的招募又不如預期那麼順利。那麼，為着補助財政上的不足，我們除了相當地增加法幣的發行，還有甚麼路好走呢？

通貨膨脹所以不能避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集中到中部和西南各省。現在許多不願意留在敵人佔領地的人們，都犧牲了他們的故鄉，跑到青天白日旗幟保護下的土地。這些人把許多法幣帶到後方來，使後方的法幣數量增加了。即使全國的法幣數量不變，許多法幣既集中到中部和西南來，這些地方的物價便不能不高，因而發生了通貨膨脹的現象。最近敵人在江南一帶關於通貨的設施，便是想加速這種法幣集中的趨向。

貨物數量的減少，也是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一個原因。戰爭阻礙了貨物的流通，減少了商品的輸入，因此市上的物品的總數，便大為減少。其結果，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就等於通貨膨脹。

從上面所提出的三個原因，可見通貨膨脹是不能避免的。

(二) 我們以為溫和的通貨膨脹是不必避免的——在近代的戰爭中，從來就沒有一個交戰國家完全避免過通貨的膨脹，而且也沒有一個國家認為通貨膨脹應該完全避免的。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當然不是一個例外。

而且事實上溫和的通貨膨脹必然引來很多好的結果，因為通貨膨脹本身就包含着經濟繁榮。這次戰爭使中國經濟蕭條，加重中國失業問題。通貨膨脹恰好是救濟經濟蕭條和工人失業的良藥。通貨相當地膨脹，經濟便可以相當地回復繁榮，失業問題便可以相當地得到解決。

很多人都怕增發紙幣會急劇地提高了物價，因此反對通貨的膨脹。事實上倘使法幣數量只作溫和的增加，物價上升的程度必較法幣數量增加的程度為少。這有三個原因。第一、通常法幣數量的增加會增加商品生產的數量。商品數量增加了，貨幣數量雖然增加，物價也不會（或不會作比例的）增加。第二、倘使法幣數量只作溫和的增

加，通貨的流通速率會略為減少的。一方面因為在戰爭時期，人們都希望能多存些現款，以為急需之用，所以人們輕易不肯把款用去。另一方面因為在物價初被提高的時候，人們會以為這種物價高漲只是一種偶然的現象，所以不願隨便購買。因此通貨的流通較平時為遲慢。通貨流通既遲慢，法幣之增發至少有一部份只有補償流通速率之減低的作用，而不會提高物價的。第三、在戰爭的初期，去年八月十六日的時候，財政部施行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對各銀行銀莊的存款，都限制提取。這種辦法雖然目的主要是救濟那個轉變的時期，但自長期間說，也有減少全國流通媒介總量的結果。增發法幣一部份是補償這種流通媒介的減少，而不會提高物價的。

(三)我們以為過量的通貨膨脹是應該絕對避免的——通貨膨脹雖不能和不必避免，但也只能夠做到一個適可而止的地步。過量的通貨膨脹，不但沒有上面所說的好處，而且會使國家通貨破產，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是應該絕對避免的。但是，通貨膨脹到了甚麼程度才算是過量呢？我們以為溫和和過量兩種膨脹的劃分界限標準是通

用貨的流通速率。倘使通貨流通加速了，我們便已到了過量膨脹的境地。通貨膨脹是否過量，也可以用人民對貨幣的信任程度來做決定標準。倘使人民對貨幣的信任很堅強，則我們還沒有過量地膨脹；倘使人民對法幣失了信仰，拿進了法幣便想立刻用出去，因此增加了通貨的流通速率、通貨膨脹便已到了過量的階段了。

通貨膨脹一到了過量的階段，物價上漲的程度便較法幣數量增加的程度為大。物價愈上漲，財政支出便愈增大；通貨愈膨脹，信用愈破產，財政收入便愈困難。到了這個地步，財政的赤字只會愈來愈大，政府只能繼續不斷地增發法幣，非到法幣完全崩潰，是無法停止的。

政府現在財政地位還很堅固，人民對國家異常信任，當然不會有過量通貨膨脹的事情發生。但為防止今後萬一起見，特提出下面幾點，說明我們應該怎樣防止過量通貨膨脹的發生：

(甲) 政府本身應該首先負起防止通貨過度膨脹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只要租稅

可以增加，只要公債可以發行，便應首先考慮增稅與向人民舉債的辦法。非到了不增
製紙幣的時候。不要增發紙幣；非到了不能不進一步膨脹的地步，不要進一步的膨脹

(乙)其次，政府應把匯兌統制起來，設法維持現行的匯率。關於這一點，政府
在去年年底已經辦到了。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匯兌若統制了，貨幣的國內價值便和
國外物價隔離了，國內物價便不致受匯率變遷的擾亂。同時匯率的穩定，在心理上會
發生很大的影響。它會增强人民對國家貨幣的信任心。

(丙)中國戰時通貨的穩定，還要靠人民一致地對政府加以信任。倘使人民自己
驚惶起來，只顧個人的私利，不為大局着想，那麼無論我們通貨的基礎怎樣堅固，人
民信任失了，通貨也會很混亂的。反過來說，倘使我們無論在任何的情況下，都肯一
致地對國家經濟和國家貨幣加以信任，加以維持，我們的法幣是永遠不會崩潰的。因
此我們要求所有愛國的人們，下一個始終信任國家通貨的決心。我們尤其是希望金融

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們，拿出良心來，做國民的一個好榜樣。我們不但希望他們不再去做那些逃逸資金（把國幣換取外幣）和相似的醜事，並且希望他們把外幣資產換回國幣，增加國家金融的地位。

(丁) 中國貨幣有沒有前途，主要還要看我們一般的經濟情況怎樣。一般的經濟沒有辦法，則通貨自然會破產的。所以站在通貨的立場說來，今後也應加緊改進抗戰根據地的經濟，發展西南的農工商業。倘使西南的經濟有辦法，則不但我們的通貨可以維持下去，中國抗戰的前途也是很光明的。

抗戰期中農業生產之建議

汪呈因

一 戰時農業生產之重要與增加之必須

現代之戰爭，已非純軍事戰爭，經濟力亦爲決定勝負之主要條件，而經濟力中，尤以農業生產爲最要。蓋農業生產，爲食糧供給之唯一源泉，食糧爲軍事上首要之必需品，民不可以一日無食，兵更不可以一日無食，無食則潰矣。興登堡於其自傳中，曾悽然言曰：「數年以來，德國軍民，食未嘗敢飽，雖有激揚不屈之精神，無能爲力。」毛奇將軍亦言曰：欲不戰而亡德國，端在破壞其農業，封鎖其食物。」披谷氏在其戰時經濟學一書中，更鄭重宣示：「於戰爭之過程中，其足以左右勝負，決定生死之重要因素，厥爲糧食。」是可知戰時食糧之重要，而農業生產之不可不首爲注意也。此次民族抗戰，既在持久，則農業生產，更爲重要，蓋持久之條件，首在糧食之能否自給自足。我國糧食素感缺乏，每年均有大量之入超，此在平時，已屬大險，值

此民族生死關頭，倘糧食仍仰給於外，是無異生死之權操之於人，危何如之。況倭奴將口岸封鎖，來糧更屬不易，而產糧豐富之區，又半淪戰區，後方各省，若不急謀生產增加，則國家生存之條件，即感莫大之威脅。一八〇六年，大陸封鎖，糧源斷絕，英人大困，幾頻於危，一九一八年，德國軍事，仍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但卒因糧食缺乏，而至崩潰。由此歷史事實之嚴重教訓，吾人當有所憬悟，而努力於農業生產之增加焉。

二 增加目的

(甲)米麥：西北西南各省，地居後方，今後對糧食之供給，實負最大之責，而西北西南各省糧食生產是否足用，實大有問題。按該兩區之農產，以稻言，陝西年產二百至三百萬担，甘肅九萬七千擔，寧夏十一萬擔，四川一萬五千餘萬担，雲南二千九百餘萬担，貴州二千五百餘萬担，共計約二萬七千萬担，合米一萬六千萬担。以小麥言，寧夏年產二十餘萬担，青海四百餘萬担，甘肅九百萬担，陝西二千四百萬担。

，四川三千七百萬担，雲南六百萬担，貴州三百餘萬担，共計約八千三百餘萬担。米麥合計，約二萬四千萬担，假如雜糧生產，能佔三分之一，總計糧食生產，亦不過三萬三千萬担，若除去五分之一飼料及種子約六千餘萬担，則僅存二萬七千餘萬担，就普通之估計，亦不過僅足供六千餘萬人口之消費。但二區中各省之人口數，據申報年鑑所載：陝西爲九、七五二、〇一五人，甘肅爲六、三六〇、〇七五人，寧夏爲四一七、七五一人，四川爲三七、四二七、五九三人，雲南爲一一、七九五、四八六人，貴州爲六、九〇六、三六一人，共計爲七千三百餘萬人；是西北西南各省之糧食，自供尚不足，每年約有一千萬人之糧食，仰之於外來，現在戰區各省難民，流亡該兩區者，爲數甚鉅，倘不急謀籌劃，糧食恐慌，將立足而待，所以爲求各該省糧食之自給，及更供軍需計，勢不得不急謀生產之增加。幸各該省，人口密度甚小，每方公里，均在一至五十人以下，正所謂地廣人稀，大有發展之餘地焉。

(乙) 棉毛·棉花之產地，原以湖北、江蘇、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六省爲最

盛，湖北年產一、〇九四、七八〇市担，江蘇二、三六〇、五五一市担，河北二、五八五、九四〇市担，山東四八六、〇六五市担，河南四七三、七六二市担，陝西九五七、三五六市担，今江蘇、山東、河北及河南南部，均淪陷敵手，生產已屬難能，所餘者僅湖北、陝西及河南南部矣。毛類向產於東三省、察哈爾、綏遠、山西、寧夏、甘肅、新疆等省，今則僅餘陝西、甘肅、寧夏、新疆數省而已。產地既行狹小，則欲求衣料之自給，非增生產力，別無二法。

(丙)林木：林木爲國家一大富源，不但可以供木材，而且又可供戰時之材料，現時西北西南建築鐵道所需拱木尤多。我國木材，每年入超額達千餘萬元，而各省竟童山濯濯，隨地皆是，棄地利而不用，殊爲可惜。西北西南，全屬多山地帶，值此抗戰期間，爲求培養富源，供給戰時材料，及掩蔽作戰工程，極應普遍造林。

(丁)茶樹：茶爲我國多年來國外貿易上之要品，桐爲我國著名之特產，全世界桐油之需要，除安南及印度外，率皆仰之於中國。據二十四年海關報告，每年茶葉輸出

數十萬至數百萬擔，值數萬萬至十餘萬萬元，其主要之輸入國，爲英、俄、美；桐油二十四年輸出額爲百餘萬擔，值四千餘萬元，主要之輸入國爲英、美。茶之產區，爲湖南年產二、二一九、九一七担，湖北四一七、六九八担，江西二〇八、八七二擔，安徽四九九、二八八担，浙江二五六、一四四担，福建六八〇、〇〇〇担，廣東一六七、〇四五担，雲南一五八、〇八五擔，廣西三〇二、一七四擔；四川二、九九六擔，貴州二七八、五九四擔；陝西九〇六擔。桐油每年之產量，則爲四川六〇〇、〇〇〇市担，湖南四八〇、〇〇〇市担，湖北三六〇、〇〇〇市担；貴州二〇〇、〇〇〇市担，浙江一九〇、〇〇〇市担，廣西二四〇、〇〇〇市担。二者除江蘇、安徽論爲戰區外，均大可發展，惜荼葉，我國故步自封，以致產量日減。而桐油業又屬新起之事業，更待推進。值此抗戰期間，戰爭利器，輸入孔亟，若無大宗貨物之輸出，則國際收支必大行虧負，而更陷窮困。茶桐既爲國際之需要，故急應增加產量，以求國家收支之平衡。

三、增加方法

(甲) 設立戰時農業生產管理局：中央設一戰時農業生產管理局，各省設立分局，網羅各項有經營農業生產實際經驗之專門人材，設計、指導、監督各項農業生產。但此項專門人員，須時時下鄉工作，不得終年逗留室內，以弄文舞墨為事業也。

(乙) 組織墾殖團：西北西南各省之墾殖指數：陝西為一五·〇，甘肅為四·六，新疆為〇·五，四川為一五·〇，雲南為三·八，貴州為二·六，由此可知其可耕之荒地甚多，值此抗戰時期，正可招移戰區流亡之難民，利用農校員生，組織墾殖團，開墾巨額之荒地，以增加抗戰經濟力。更由墾殖團編練壯丁隊，平時既可以防匪，必要時尚可以殺敵。先由各省設一墾殖辦事處，次就荒地較多之縣設分辦事處，現今陝西、四川、湖北房縣已有墾殖之運動，中央可利用擴大而實行之。

(丙) 組織農業推廣隊：就非戰區域各省原有之農業機關人員，分縣或分區，實際下田指導農民，興修水利，防除病蟲之害，以科學方法，選種、施肥、栽種，並利

保甲制度，以政治力量，推行良種美法，利用合作社組織，改善農民經濟，調濟農村金融，則生產不愁其不加矣。

(丁)組織各省農產統制委員會：各省組織設立農產統制委員會，統制生產方法，生產土地，栽種種類（栽種戰時需要作物，如稻、麥、茶、桐等，嚴禁栽植鴉片、烟草等），限制勞工（除服兵役者外，無論男女不論階級須一律從事生產工作）。糧食分配與販賣，以及限制濫費與過度之消耗。中央已有農產品調整委員會之組織，宣與各省統制委員會分工合作，或合併之，澈底施行各種農業生產之統制，以適合長期抗戰之需求。

(戊)分設農產品工廠：我國初步建設之工廠多集中上海、天津、武漢數大都市，與經濟原則殊不適合，現今急宜將農產品製造工廠疏散至各省原料出產之區，既可當地取得原料，又可就地銷售，而農產品價值亦可提高，互相裨益，一舉而數得也。如湖北漢水流域，陝西渭水流域之棉花產量甚豐，紡織廠即可設于二流域。毛皮豐產

於西北，毛織廠製革廠即可分設于青海、甘肅、新疆果品甚豐，可設立果品製造廠。其他麵粉廠、製油廠等均宜就各原料出產豐富之地而設立之。

(己) 提倡栽種陸稻：西北西南各省，氣候乾燥，雨量稀少，甚少適宜於水稻，為求米產之增加，宜提倡栽種旱稻，而免旱災之虞。且東南沿海善於栽種種作之人民，仍可從事原有工作矣。

(庚) 提倡栽種馬鈴薯：馬鈴薯為一種多產作物，在同一耕種面積上，較稻麥多產數倍，且性又耐燥，極適宜西北西南之高燥土地，在抗戰期中，為求食料加多，急宣提倡普遍栽種。馬鈴薯之營養分不亞米糧，德國人多食之，體健性強。

(辛) 提倡種食雜糧：西北西南各省人民原多栽種玉米、小米、甘藷等雜糧而慣食之，惟東南及中部人民慣食米糧，一旦遷徙邊疆無米之區，食料種類甚是問題，除提倡栽種陸稻外，急宜提倡混食雜糧及宣傳栽種雜糧之改良方法。

(壬) 提倡改食糙米及胚芽米：糙米營養分較精米豐富，不特蛋白質及灰分多，

而且維他命完全含在米皮及胚芽內，精米曾經搗搗手續，米皮胚芽已損失，故營養分甚缺乏。若大家能改食糙米，固可減省十分之一餘米糧，全國米糧以十萬萬担計，則可減少一萬餘萬擔，換言之，可增加一萬餘萬擔米糧，同時更可增加國民健康，尤其是南方大批腳氣病可防治也。待戰勝後，再用新式碾米機，製造胚芽米，以代糙米為食料。

(癸) 實行兵工分配：我國勞動分配之不均勻，盡人皆知，有閒階級與婦女終年無所事事，一般農民與雇傭日夜操作，值此抗戰期中，壯丁多抽調前方，後方生產工作，必須有以統制，庶無勞工缺乏之慮，凡年在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男女，除另有兵役工作外，不論貧富。須一律強行勞動服務，違則懲罰。

上述十項增加農業生產之方法，宜同時舉行，雖其間不無輕重之分，但為求長期抗戰之經濟力量充裕，及最後軍事勝利，則不得不竭全力從事後方農業生產，芻蕘之見，尚祈識者有以教之。

徵抽壯丁和生產問題

漢夫

抗戰五個月以來，我們在軍事上局部的嚴重失利，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據蔣委員長的報告，死亡有三十萬之多，又據各方面估計，潰散的也不少，現在極需補充。而補充之困難，成了目前最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了。除開補充之外，現在更需要建立幾十師強有力的、鐵的軍隊。要建立能夠最後戰勝敵人的軍力，就要補充舊軍和組織新軍。在這裏，重要問題之一，就是人力的來源。

以我國人口之衆，完成這一補充和建立軍隊的重要任務，應當是不成問題的。我們有的是壯丁。農村中、工廠裏、商店和學校內，都有着成千成萬的勇敢有爲的壯丁。事實上在抗戰開始前，即在全國進行了壯丁訓練，在抗戰開始後，壯丁的訓練更加緊，壯丁的徵調也在不斷的進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怎樣動員壯丁來擔負這個光榮的參加抗戰的任務，怎樣在動員前使壯丁無家庭之顧慮。而不是單靠事後以軍

法加以裁制。也就是說，怎樣才能使被徵壯丁和它的家庭的生活有相當的保障。這個問題的提出，還不祇是由於這一方面的考慮。因為除此而外，還有嚴重的生產問題。在生產衰落而又亟需提高，以充實軍需的現在，尤其是在軍事工業必須積極加以發展和保障民食軍糧的現在，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怎樣使抽丁不妨礙生產，不但不妨礙生產，還能適當的提高生產，換句話說，怎樣確立和執行『徵抽壯丁而不妨礙生產』的原則？

要確立和實現『徵抽壯丁而不妨礙生產』的原則，我們以為下列的幾點，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第一：進行合理的徵募工作。家庭赤貧，非依本人即不能維持生活者，都應該免去兵役，總要使每個家庭的生產，不致於因抽徵壯丁，而受到影響。當然，由於宣傳教育等政治動員做得切實深入，而當地有適當的維持生產的協助辦法，壯丁自願應徵出發者，還是應該接受他的要求，准其應徵的。

第二：政府地方團體，及民衆，應給應徵壯丁家屬以必要的幫助。例如『湖北漢陽縣蔡甸鄉的上堡村，就由士紳公議規定，合堡抽丁四名，用志願報名辦法；此四人抽去後，其家屬的生活、耕種，即由合堡攤派分擔。』組織耕種隊，幫助抗日壯丁家屬，是一種幫助。又如：江西星子縣的某一村的一位農民說：『老爺們說：「只要打了日本，一年不種田，要什麼緊？」可是我們害怕，不種田拿什麼完租？自己挨餓不說，吃官司即受不了。』所以，減租也是一種幫助。此外，種籽、工具、和資本借貸都應依照已頒佈的辦法和法令，以及動員民衆促其實現。

第三：改良生產技術，改善生產組織、壯丁被徵調後，各業生產，非僅藉第二項所說的各種幫助，就能提高生產。它所能做到的，恐怕還是維持多於提高。要提高生產，還要注意到技術的改良。我們認為中國鑄冶工程學會討論抗戰時期的鑄業生產問題，和工人發明，都應積極提倡和鼓勵的。我們不僅要向外國取得軍事人材和軍事技術援助，同樣也要取得一般的技術人材和生產技術的幫助。單有前者而缺後者，是不

能提高生產，使生產適應戰時的需要的。西班牙政府，在反法西戰爭中，創造了新工業和新技術，提高了軍需工業，發展了一般的工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要知道，最新式的步槍上的一個螺絲釘，也需要新的技術才做得成配合。

在生產組織方面，也要加以調整，在工業方面，務必使大規模的生產，有適當的分工，生產部門間，有緊密的聯繫：小規模的生產，更應有很好的調節。一切都要以少消耗浪費，多分工合作為原則。農業方面，如果能經過耕種隊或助耕隊的組織，更合理的耕種土地，獎勵農民集團的生產借貸，大致也能够提高農村生產的吧。

第四：改善生活，發展工業，吸收失業工人及難民。未被徵招的在業壯丁生活，設若能提高，也是能提高生產的。如在工業中相當地增加工資和減低工作時間，使工人的生活有保障，而身體更健康，精神更煥發，生產的提高是不成問題的。此外，還應該獎勵和發展大小規模的工業，以至於家庭工業和手工業，沒收敵人和漢奸的工廠，繼續並擴充它的生產。這樣，不僅能安插失業工人和難民，還能够使抗戰時的需要

，得到較充分的供給。

第五：更積極的進行在業壯丁的軍訓，以備隨時徵調。爲了不斷的訓練大批壯丁，並且不致於妨礙生產，應更積極的進行在業壯丁的訓練。實施訓練時，更應顧慮到不使生產受影響。比方，在進行工人軍訓時，工資不應扣除，工作則應由其他工人代替工作（這還可以幫助解決一部份失業問題），在農村裏，農忙時進行的軍訓，應該給以充分的勞力扶助。而且，這種訓練，不以一次爲限，應定期的時加重訓。這樣，徵調和生產，都兩得其益。

最後，要重複的說，從政治的教育和動員，來提高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生產的加緊，對工廠的愛護，對研究發明的努力，從政治上來動員壯丁參加軍訓，和參加前線抗敵，是解決徵抽壯丁和提高生產的問題的關鍵！